

#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6年8月31日第20期

总第166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 《记忆》166期

## 林彪研究专辑（一）

### 目 录

#### 【专 稿】

余汝信 林彪 1971 年 5 月信稿辨析

蒋 健 出逃的林彪专机为什么要带油迫降？

——兼谈蒙古对中国三叉戟飞机坠毁事故调查报告的解读

#### 【评 论】

蒋 健 林彪与抗美援朝的那些事

不 平 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评析(三)

#### 【资 料】

吉林省暨长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 年 3 月 10 日）

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 年 3 月 25 日）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1968 年 3 月 28 日）

#### 【读者来信】

1. 不平再答越人

2. 越人答不平

3. 何芬奇谈沈迈克新著之书名的翻译

#### 【本刊声明】

【专稿】

## 林彪 1971 年 5 月信稿辨析

余汝信

### 一、林彪信稿的真实性无可置疑

对于中国当代史研究者而言，因为缺乏可靠的公开材料，林彪在 1970 年庐山会议闭幕至“九一三”之夜长达一年的思想、活动轨迹，一直是系统研究的空白。故而，近年披露的林彪 1971 年 5 月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长达一千一百多字的信函，就显得格外珍贵。

鉴于《炎黄春秋》2012 年第 1 期刊登的《吴忠谈“九一三”事件》在转述该信稿时与原文存在不少误差，笔者在《炎黄春秋》2013 年第 5 期上，披露了经与原文（影印件）反复核对后的信稿，全文如下：

主席：

五月二十日，我找了周总理谈了谈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我要总理考虑和请示主席。现将我谈话的大意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并盼主席能找总理一谈，由总理采取落实的办法。我的意见如下：

经过五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这个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党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现在是要巩固胜利，是要贯彻“九大”的团结路线，保证“九大”以后，特别是批陈整风以后（批陈整风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因为陈伯达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坏蛋，他利用庐山会议的机会乘机作乱，因此必须肃清他的影响）党中央和中央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保持巩固的团结，预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险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险行为，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紊乱，引起国内国外的不良反映。为此，要想出具体办法。我想到了以下的办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是在暂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等“四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评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则提升其他人接替。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

第二，将以上规定传达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命。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命，则其本人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严办。而绝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固守。

第四，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虽然是很好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以调往别处，换一个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军来，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万一发生事故起见，所以想到以上的做法，但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备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主席考虑交总理遵办。

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上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一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复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根据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

这些内容，对外都应严格保密，尽可能免除副作用的发生。

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笔者在发表以上信稿全文的同时指出：“一、这一份已誊清的信稿，并非林彪亲笔所写，而是其他人的笔迹。二、信稿的末尾，没有署名，没有落款日期。三、在原‘林办’秘书中，目前尚未有人公开承认是该誊清稿的抄录者。换言之，该信稿形成过程是研究者目前尚未弄清楚的，包括：是否确为林彪口授？谁是林彪口授时的记录人？信稿口授、起草、誊清的日期？为什么没有署名？为什么未能发出？这一切，目前尚未有答案。”<sup>1</sup>



林办工作人员与林彪一家合影。前排左1李根清，左2罗孝礼，左3张云生，右2林立衡，右3林立果，右4李春生；第二排左1张益民，左2郭连凯，左3王淑媛，左4叶群，左5林彪，右1李文普，右3于运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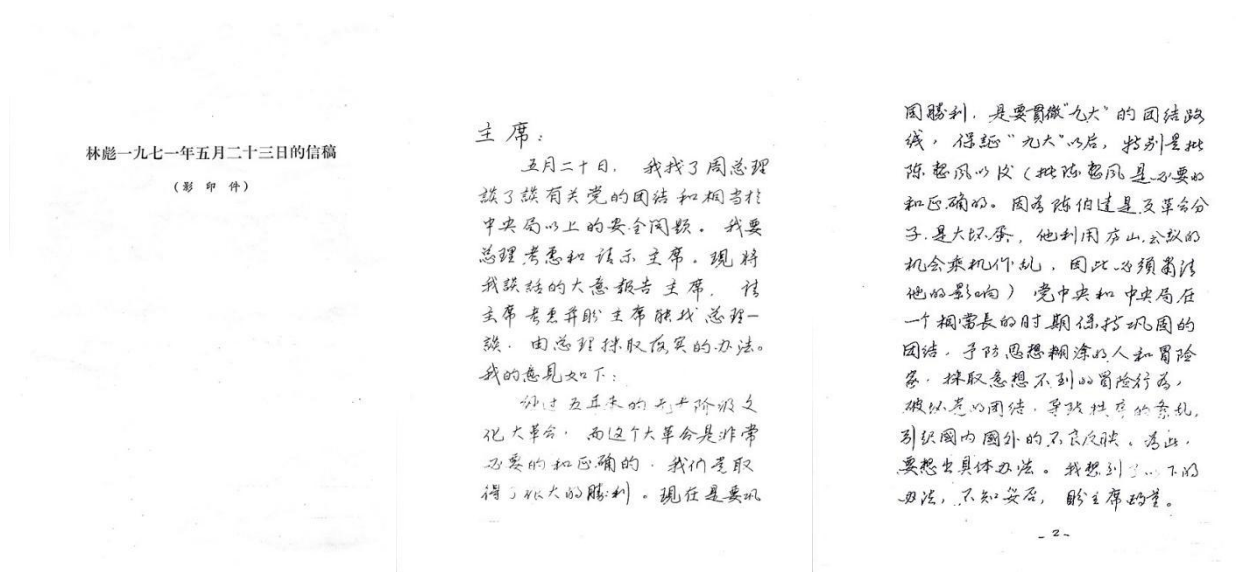
当年担任林彪办公室保密员一职的李根清，看了《吴忠谈“九一三”事件》及《“林

<sup>1</sup> 余汝信：《“林彪信稿”的本来面目》，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页64。

彪信稿”的本来面目》两文，并与时任林办机要秘书的于运深共同回忆、探讨后，在《炎黄春秋》2014年第11期上发表了《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一文，其中提及了林彪这一信稿产生的简略过程。李根清称：“过了几天<sup>1</sup>，林彪向秘书于运深口述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建议对现任政治局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实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遇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机动指示’……于运深把信稿交给我，让我誊清后送林彪签发。也许是林彪又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合时宜，难以落实，或其他什么原因，这封信始终没有再交给我通过机要渠道送达。”

## 二、不排除毛当时已经知道林的想法

2016年3月31日，笔者在北京见到了李根清和于运深。笔者向李、于两人展示了林彪信稿原文的影印件。



（中央专案组在极小范围内印发林彪信稿时的封面，林彪信稿第1、2页，信稿由李根清誊清，下同。）

<sup>1</sup> 指1971年5月中旬周恩来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处后几天。

第一、实行“三不”的做法。即是在指定十年之内，对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大军区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经过批陈整风以后，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实行不逮捕、不关押、不杀、不撤职务。“三不”，如果他们某个成员有错误，可经过党内思想批评来解决，他们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染病的，则让其其他人接替。“三不”是特殊情况，要执行主席面授的指示。

第二、将上述规定传达到北京。

林彪与于运深谈话

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担任卫戍部队的每一士兵，要他们根据这个规定，任何时候，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提人、杀人等乱命。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命，则其本人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无论逃至何处，均应归案究办。而绝不可托辞是执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第三、为保持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个人造山，建议由华东、东北、山东各派一个独立营来担任

固守。

第四、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这个部队能是根部的部队，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适宜，以调往别处，按一二三、三野或一野的某部接替他们的任务为宜。

我的上述想法，是为了这次批陈整风会议文件，有的同志在担心着安全问题。他们的心情是忧虑的，因而是值得重视和深思的。我想，为了防止一息生事的预兆，所以想到以上的做法，但有些一点也绝不是万全或甚至是不正确的。特报告主席，请

(林彪信稿第3页，4页、5页，红框内文字为于运深笔迹。)

主席与于运深谈话。

关于第一条和第二条，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担任警卫部队的干部开会宣布，由他们口头或文字上传达到每一个士兵，并且每隔两三个月重传向士兵传达一次。十年后情况，基本上也应当按这个精神办理。首都以外的部队，可传达到师、团以上干部。

这些内容，对外部要严守秘密，尽可能先传达作用的是。

我很想和主席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

此致

敬礼！

(林彪信稿第6页、第7页)

四十五年后，目睹自己年轻时书写的文字，年逾古稀的李根清万分感慨！李称，信稿是他的笔迹，毫无疑问，这份信稿是他誊清的。于运深也说，信稿是他记录的，其中“对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则按退休干部处理”这一句话，是他对照林彪口述记录稿，发现李根清的誊清稿漏了这么一小段，于是由他添写上去的。

重见自己多年前的笔迹，引发了李根清更多回忆的思绪。李称，这封信出自林彪之口无疑，思想、语言、口气都是林彪的风格，如称陈伯达“是大坏蛋”，就与他“五一八讲话”所说的“王八蛋”、“坏家伙”如出一辙；“思想糊涂的人”、“冒险”、“冒险家”，也与“五一八讲话”所说的“糊涂虫”、“他们想冒险”几乎相同。又如称大军区一级的

单位为相当于“中央局”，称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为“华东、东北、山东（军区）”，也是林彪的一种习惯用语，就像毛泽东称黄永胜“参谋总长”一样。信稿的思想也是林彪的，实行“四不一要”这样重大的建议，只有林彪才敢于提出来，步步深入的批陈整风使林彪担忧一批党政军高级干部的政治安全和人身安全。再如，“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除了林彪，又有谁还敢向毛泽东提出这样的请求呢？

笔者十分赞同李根清以上说法。笔者更注意到了林彪信中有关“乱命”的提法<sup>1</sup>。林彪称，“不执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长有关对中央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捉人、关人、杀人等乱命。如果他们借口是执行命令而执行乱命，则其本人应受法律的严厉制裁。”林彪声称“除主席以外”，恐怕是语带双关的“客气话”，恐怕林内心所指，其实也隐含了毛在内。给毛本人的信函，用上“乱命”这样强烈的带刺激性的语言，在那个时候，除林之外，何人敢说？！

李根清对笔者称，2013年10月，他曾与于运深一起回忆，两人都记得，当时做了两份誊清稿。只是为什么搞了两份？个中缘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现在看到了誊清稿的复印件，才豁然省悟——原来信稿誊清后，于运深发现漏了一小段，就给补上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件，是不应该有这样的修补文字的，李根清便又工工整整誊清了一份。于是，信稿就有了两份誊清件，一份可以送毛，另一份存底。

李根清回忆，林的信没有再交给他经机要渠道送出。于运深也这么说。没有送出的原因，据于说，叶群给周恩来打了电话，告诉他林彪信稿的意见，被周劝阻了。

笔者对李根清称，在毛家湾林彪住处发现的，仅有存底的这一份。那么，李、于记忆中重新誊清、可以送毛的另一份，到哪儿去了呢？李称“道不明”。

<sup>1</sup> 乱命，悖谬的命令。典出《左传·宣公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颀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颀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又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二回：“望吾王收回乱命，庶可免亡国之殃也。”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当伪诏命各省焚教堂杀教民，诸疆臣皆失措。李鸿章久废，居京师，方起为粤督。乃各电商鸿章，请所向。鸿章毅然覆电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蔡东藩、许廑父《民国通俗演义》第十一回：“老袁欺人太甚，既召他进京，又令他南返，不但失信芝祥，并且失信直人，这等乱命，我尚可副署么？”



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份誊清件，并没有林彪签名，没有署上日期。另一份信稿是不是签了名，经叶群通过另外渠道送达了呢？如果不是这样，中央专案组<sup>1</sup>在向毛泽东和中央报告查抄到这封信的时候，何以能认定它是5月23日写的呢？笔者再三询问李、于，当年他们被审查时，有没有人问过这封信的产生经过？他们均答，肯定没有。这样，中央专案组在认定5月23日这一日期的过程中，必定要有其他的证据。

据此，笔者大胆假设：重新誊清的另一份信稿，很有可能最终由林彪签名并署上日期送了给毛。李根清称，他没有这样的印象（收、发、办文是李的本职工作）。但他说，也不能绝对排除另一份送了给毛的可能性。

无论这封信最终是否送到了毛的手中，林彪在信中所表达的对“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的担忧是明白不过的。这封信是林彪思想的明确表达，是林、毛歧见的一份重要证明。5月20日，林彪已与周恩来谈过并要周“考虑和请示主席”，周极可能不敢隐瞒林的要求而随后报告了毛。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不排除毛在当时已经知道林的这些想法，但没有理会林的建议，反而加紧了围剿林的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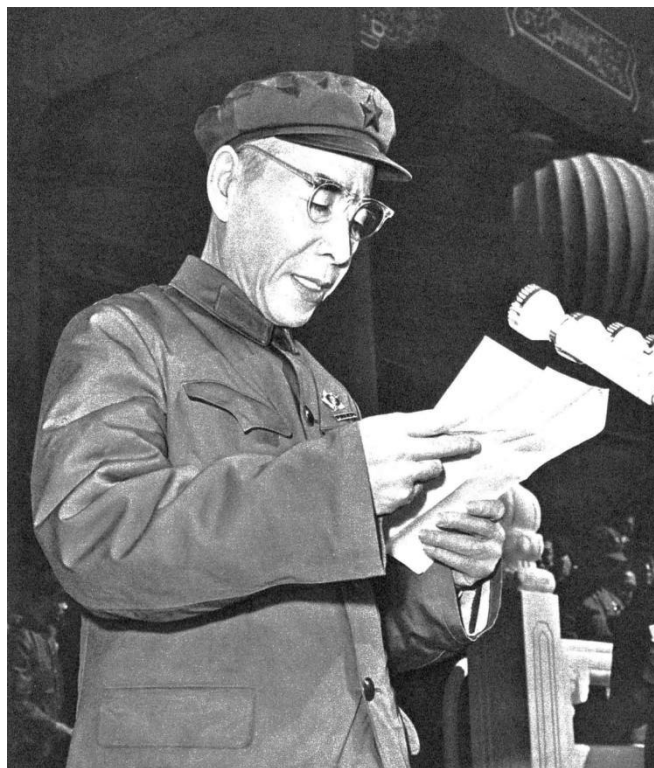
### 三、从庐山会议结束至1970年底的中央政治生态

为了弄清林彪口授这封信的背景，笔者将1970年9月庐山会议结束至1971年8月毛泽东南巡一年间相关史实重新梳理了一遍后，骤然醒悟！以前未能看清的一些问题，突然变得豁然开朗，有了头绪。

笔者认为，庐山会议之后，毛、林之间的政见分歧，渐见明显，已难愈合。分歧首先体现在对待所谓庐山会议上“犯错误”的高级干部处理问题上，毛、林意见相左。

---

<sup>1</sup> 审查“林—陈反党集团”问题的中央专案组，经毛批准，1971年10月3日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进行日常工作。



1970年9月16日，在庐山会议结束刚好十天后，毛泽东阅批汪东兴第二次书面检查曰：“此件请汪东兴同志面交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一阅，进行教育。详由东兴面谈。”9月22日，周恩来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对汪书面检讨的批件给林彪看，“提议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sup>1</sup>毛、周、康此

（1970年“十一”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载《人民画报》1970年第12期）

举，是借汪检查而逼黄、吴、叶、李、邱检讨，当然，能逼到林，更好。但林不为所动，仅“表示同意由周恩来、康生约黄等谈”，显现出对此事十分冷淡的态度。

同年10月1日，国庆二十一周年纪念日。毛、林白天、晚上均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活动，林循例发表了国庆讲话。不知外间是否注意到中共第四号人物陈伯达的身影已经消失，但表面上必须给予外间林还是毛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强烈印象。

国庆日过后未及半月，10月14日，毛在吴法宪9月29日给他本人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多处严厉批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还批示称，“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sup>2</sup>其他宣讲员，指黄永胜、叶

<sup>1</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页336、338。

<sup>2</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页347-348，部分标点符号根据中共中央正式文件更正。

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毛再次诱导“林彪系”其他成员作出检讨。

10月15日，毛在叶群10月12日写给毛本人的检讨上，作出多处比对吴法宪检讨更为严厉的批示：“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sup>1</sup>

叶群是林彪的妻子。由于林彪很少出头露面，叶群在外间往往给人以林彪代言人的感觉。毛对叶群在强大政治压力下的检讨作出如此毫不留情的批示，实际上是给林彪予颜色。笔者为此曾写道，“不给叶群面子，不就是不给‘接班人’林彪面子吗？！毛泽东给高级干部的检讨写如此‘细致’如此严厉的批语，从1959年那一次庐山会议批‘彭黄张周’后从未有过！林彪自此以政治上的沉默对抗之。”<sup>2</sup>

现在看来，林彪也并非完全沉默。在1971年5月23日这封信里，林彪针对毛“破坏党的团结、导致秩序的紊乱”的做法，明确表示了他对“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的担忧，实际上也就隐含了对毛逼人检讨的不满。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称：10月15日，周恩来将毛批示的吴法宪检讨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阅，在附信中说：“法宪同志的检讨信和主席批示，已送呈林副主席看过。”“主席要汪东兴告诉我和康老在请示林副主席后约有关同志一起谈谈。还有，主席对叶群同志检讨信，也有批示，待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阅后再送你们。”随后，周恩来同康生到林彪处，同林彪商量约黄永胜等人谈话事。<sup>3</sup>值得注意的是，吴法宪、叶群的检讨，均是写给毛泽东一人的，检讨抬头上没有林彪的名字。故而，林彪在吴、叶的检讨上，没有只字批示，《毛泽东年谱》也没有提及林彪对吴、叶检讨的态度。

<sup>1</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页348-350，部分文字和标点符号根据中共中央正式文件更正。

<sup>2</sup> 余汝信：《〈林立衡关于“九一三”经过写给中纪委的材料〉解读》，载《“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3年5月版，页347-348。

<sup>3</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页350。

11月6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中央组织宣传组由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任组员。该小组军方只有李德生一人，被视为林彪圈子中人统统排除在外，文革极左派再次全面掌控了中央组织宣传大权。

12月16日，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给军委办事组并报中央的报告批示称：“林、周、康及中央、军委各同志：此件请你们讨论一次，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林彪同志对我说，他都不便找三十八军的人谈话了。北京军区对陈伯达问题没有集中开过会，只在各省各军传达，因此没有很好打通思想，全军更好团结起来。以上建议，是否可行，请酌定。”林彪对此作了表态性批示：

“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希望全军在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更好地团结起来。”毛的批示强词夺理，陈伯达参加解决华北一些省的问题是中共中央决定的，怎么能说“中央没有委托”、“乱跑乱说”？

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并与其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毛在谈及个人崇拜问题时称：“说我是个人崇拜。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作华盛顿。你们的华盛顿所在的那个地方就叫作哥伦比亚区。”“总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诺没有人崇拜你，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的书写出来没有人读你就高兴啦？总要有点个人崇拜，你也有嘛。”“你们美国每个州长、每个总统、每个部长没有一批人崇拜他怎么混得下去呢！”在谈及1966年文革发动初期情况时，毛称：“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倒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现在就不同了，崇拜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

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 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斯诺称：“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毛称：“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斯诺称：“我有时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称：“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12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毛“最近”会见斯诺的消息，并刊登了毛、林和斯诺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谈话纪要》至党的基层支部并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

毛泽东在一个外国人面前，利用一个必然会对外公开的渠道，不仅表露了对“个人崇拜”十分实用主义的态度，而且表露了对林彪很不友好、很不客气甚至“讨嫌”的情绪。这对于林彪来说，不啻是一个十分不祥的信号。

12月19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当日报送的中央政治局18日晚传达和讨论毛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和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即华北会议）<sup>1</sup>有关事宜报告批示称：“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林彪同日批示称：“完全同意主席批示。”李德生、纪登奎奉毛指令成为华北会议的监督人，本来地位比李、纪高的黄永胜、李作鹏，反而成了配角。

#### 四、1971年头三个月的中央政治生态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讲话称：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了反党分子

<sup>1</sup> 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又称华北会议，1970年12月22日至1971年1月24日在北京召开，参会者为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有关单位负责人共499人。从1971年1月9日起，出席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会议。会议前期由李雪峰、郑维山主持，毛认为批陈不痛不痒，提出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会议随即改组，由周恩来代表中央主持，会议结束时周代表中央作了结论性讲话。

陈伯达的叛变罪行，揭发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等同志的严重错误。”“李雪峰、郑维山同志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郑维山过去紧跟杨成武搞山头主义、独立王国，这次又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站在错误路线一边。李雪峰过去紧跟刘、邓，同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坏人混在一起，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紧跟刘、邓、陶。主席挽救了他。他不但不改，这次又跟着陈伯达跑了。他和陈伯达在思想上有共同性，有个人野心。”“根据会议中李雪峰、郑维山的检查和大家的揭发批判以及表现出来的情绪，中央认为李、郑两同志继续留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担任原来的领导工作是有困难的，因此，中央决定：将李、郑两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检查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周在同一讲话中又称，“中央决定：李德生同志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同志任第一政委，纪登奎同志任第二政委；谢富治同志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同志任第二书记，纪登奎同志任第三书记。”

2月25日，经毛批示同意，中办以中发[1971]6号中共中央文件将周恩来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发至县、团级。同时，将《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和李、郑两人的检查亦发至县、团级。

李雪峰免职后即被押送至安徽关押审查。1973年被定为“林彪集团”成员开除党籍。直至文革结束六年后，1982年中央才为其平反恢复党籍。郑维山免职后亦同样被押送安徽部队农场隔离审查，时达八年之久，直至文革结束三年后，1979年12月中央下发《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时平反，1982年恢复大军区正职，任兰州军区司令员。

对李、郑的不公平处理，毛、周显然要负全部责任。林彪在李、郑处理过程中，至少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尚未见到其任何明确的表态、批示。联系林彪给毛的信，笔者认为，信中所提出的“四不一要”，极有可能就是因为其私底下对李、郑处理的不同意见而引发

的。李当时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政委、党委书记，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郑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李、郑为谢富治之后的军区第二、三把手，基本符合林彪所指“相当于中央局以上人员”的范畴。

2月19日，毛泽东对周恩来报送的一个请示报告批示称，“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毛点名军委座谈会，再次敲打林、黄、吴、叶、李、邱。2月23日，经毛批示“照发”，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名义将毛的批示转发予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或党的核心小组，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将毛对军委办事组及李、郑的批评传达至省、军级。林彪对毛此批示没有表态。

2月20日，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报送的关于学习讨论毛“重点在批陈”指示情况的报告批示称，“你们几个同志，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周、康阅后，退军委。”<sup>1</sup>与昨日（2月19日）的批示一样，毛再次借批陈问题敲打林、黄、吴、叶、李、邱。对此，林彪再次没有表态。

3月1日，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2月28日给毛、林、周、康的《军委办事组关于传达毛主席批示的报告》上批示：“已阅，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未见林批示。报告称，这次军委座谈会，由于我们没有抓住批陈这个重点，结果会议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军委办事组有几个同志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应在军委座谈会上联系自己的错误，通过批陈进行自我教育，清理思想，但没有这样做，造成被动，一错再错。

3月21日晚，在庐山会议半年之后，黄永胜在强大政治压力之下写出检讨报告，仅送毛一人。邱会作于本日、李作鹏于22日也分别向毛一人作出检讨。邱在检讨中交代，庐山

<sup>1</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页369。

会议上陈伯达与邱、吴法宪、李作鹏一起谈了话，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谈了天才的问题；二是谈了张春桥的一些问题。“由于我对张春桥同志有些意见，已经被他利用了。”黄永胜在检讨中称，“办事组有的同志对张春桥同志有些意见，我是知道的。对这个问题，我没有能按‘九大’路线很好作团结工作，相反自己也有不满情绪。我这种态度，也影响他们，起了不好的作用。这个问题，总理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说，要注意团结春桥同志，但我没有听进去。这是很错误的。”

3月22日晚，毛将黄、李、邱书面检讨送周恩来等阅，并让江青转告称，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毛“不要再失去机会了”一句话，不仅是对黄、吴、李、邱的最后通牒，也是对林彪、叶群的严重警告。当天晚上，江告黄、李、邱，称毛对他们的书面检讨“比较满意”，他们表示希望能得到毛的亲笔批示。23日下午，周、康、江讨论黄等三人书面检讨，并提出召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让黄、吴、叶、李、邱在会上检讨。周、康、江于23日将上述有关情况书面报告毛，并将黄、李、邱的书面检讨送还毛。<sup>1</sup>以上商讨过程，林彪均被排除在外，并不知情。

3月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书面检讨上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的问题。”下午，毛在中南海住处同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等谈批陈整风问题。毛同意召开一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sup>2</sup>，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需重写检讨，让周恩来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书面检讨及毛的批示送林彪阅，并要求在场的人，除康生外，乘火车到北戴河向林彪作一次汇报，时间在林看完黄、李、邱的检讨之后。<sup>3</sup>

3月30日，毛泽东利用阅批河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子厚检查之机，再次敲打军委办事组黄、吴、叶、李、邱称，“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

<sup>1</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页374。

<sup>2</sup> 4月15日至29日，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地方及军队的负责人共99人参加，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参加了会议。

<sup>3</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页374-375。



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5月6日，中办以中发[1971]34号中共中央文件将毛的批示和刘子厚检查印发。此文件未见印发范围，亦未见林彪批示。

3月30日、31日，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在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几次会议的情况，毛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准备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据《毛泽东年谱（1949-1976）》称，“林彪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自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工作部署和今后工作方针、措施，对军委办事组几位同志的检讨很高兴，要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sup>1</sup>对照5月23日林彪的信，林是否说过这样的话，颇有疑问。即便林这样说过，也是言不由衷的。

## 五、林彪生命中的最后五个月——毛、林关系濒临绝境

1971年4月5日，经毛同意，中共中央决定纪登奎、张才千为军委办事组成员。这是毛再次对军委办事组掺沙子。

4月9日，吴法宪、叶群分别向毛一人作第二次检讨。两天以后，4月11日，毛泽东批示称，“恩来同志：吴法宪、叶群二同志重写过的自我批评，我已看过，可以了。请连同黄、李、邱三同志的自我批评，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毛将二人检讨批予周而没有批予林，林也对此没有任何表示。4月15日，中办将军委办事组2月28日报告，黄、邱、李的检讨和吴、叶第二次检讨一并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印发。

既然已经“可以了”，又如何“作适当处理”？林写上述这封信，直接针对的，似乎就是关乎对黄、吴、叶、李、邱的处理，希望能真的像毛自己说的那样，还是让他们“以

<sup>1</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页376。

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的问题”，在实践中改正，而不是像李、郑那样调离原职（其实是撤职查办），自然，这只是林的一厢情愿。笔者曾称：“其实，毛泽东在放‘可以了’、‘作适当处理’的烟幕弹同时，私下里正为给林彪作最后的政治清算作准备。”<sup>1</sup>

4月19日，林彪从北戴河回到北京。次日，周恩来将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及毛有关批示送林阅，并示意林到会并讲话。林彪没有出席会议的意思。<sup>2</sup>

4月24日，毛泽东对周恩来报送的关于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情况的报告批示称，“已阅。基本同意。”报告称，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毛批注：“我这几天不出门。”在报告称“如主席还有新的设想，亦请批告，如能约我们一谈，更所盼望”处，毛批注：“可以不要谈了。”<sup>3</sup>

“可以不要谈了”也就是“没有什么可谈了”，其实，这也是毛此后对林彪总的态度，在此态度之下，林与毛已不能正常沟通。林在5月信稿提出“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只能是一厢情愿。

4月29日，周恩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全体大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总结讲话。周称，“这次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从4月15日到29日，共开了十五天。前七天主要是讨论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位同志的书面检讨，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结合自我教育，并读有关文件。后八天主要是阅读和讨论陈伯达罪行第二批材料，进一步揭发和批判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交流各地批陈整风的经验。”周又称，“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的错误，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在组织上是宗派主义错误。五位同志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有的同志把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不真实情况，向上报告，向下传播，有的同志未经核实，就信了，报了，传了，更严重的是，上了陈伯达的圈套，干扰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九届二中全会。”

<sup>1</sup> 《“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实与辨析》，页348。

<sup>2</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页379。

<sup>3</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页380-381。

“五位同志的检讨，是好的。各组有几点共同的想法：1. 承认了，检讨了，这是好的；2. 错误是严重的，自我批评不够深；3. 希望今后好好改正，在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也就是毛主席在3月24日批示中所说的：‘以后是实践这些声明的问题。’”

同日，中办以中发[1971]32号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周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提纲。毛批示：“同意。”林批示：“完全同意主席批示。”林的批示完全是应付式的。其实，林内心并不同意毛这样连续整人的做法——整完陈伯达，又整李、郑，再整黄、吴、叶、李、邱，最后要整到林自己头上。其时，林应已将5月23日给毛的信打好了腹稿。林所谓“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现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员，基本上应当说是可靠的”，虽然没有明说，显然应该包括黄、吴、叶、李、邱，更包括林自己。

5月1日晚，毛、林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五一”庆祝晚会，这是毛、林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有人说，与毛同坐一桌的林，入席后神情冷淡，未有与毛打招呼，不几分钟后即离席不辞而别。又有人否定以上说法，称林未见异常，神情还颇为愉悦。惟无论如何，这天晚上，毛、林之间缺乏语言交流却是千真万确。



毛、林、周 1971 年“五一”在天安门城楼上，载《人民画报》1971 年第 6 期。

5月20日，我们已经知道了，林彪找周恩来谈了“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林要周考虑和请示毛。23日，林彪写了上述一封给毛的信，将林与周谈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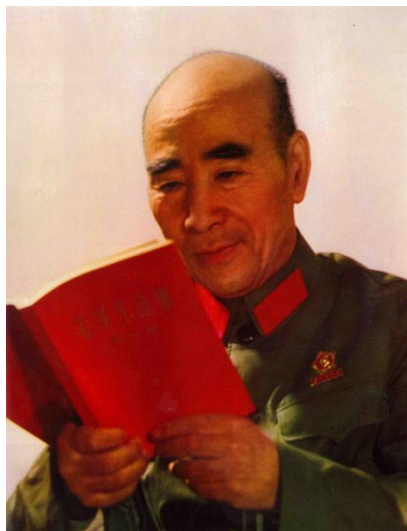
的大意报告毛，并称“我很想和主席谈谈。如主席什么时候有时间，请约我一谈。”据目前所知，林的请求并未得到毛的回应。

6月3日，毛、林在北京会见罗马尼亚共产党总

（毛、林1971年6月3日会见齐奥塞斯库，载《人民画报》1971年第7-8期合刊）书记齐奥塞斯库。据新华社称，毛、林、周、康同齐奥塞斯库等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这是林最后一次见到毛。据目前所知，在这样的外事场合，毛、林之间并没有机会进行单独的交流。

7月16日，林彪夫妇离开北京抵达北戴河<sup>1</sup>。林彪在京期间，江青为林彪照了一张捧读毛泽东选集的照片。这张照片题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作者署名“峻岭”，发表在1971年7-8月合刊的《人民画报》上。（左图）这是毛、林关系濒临绝境前的回光返照。

8月12日，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在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当日，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由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组成筹备小组，着手召开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sup>2</sup>筹备工作明显地将林彪圈子中人排除在外。



8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京南巡。此行最终目的，是亲自发动各地诸侯，以彻底解

<sup>1</sup> 林离京时间据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10期。

<sup>2</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页387。

决林彪问题。

历史的车轮，正以不可逆转之势，加速驶向“九一三”！

## 六、简短的结语

以当日情势而言，林彪致毛信中所表露的对“有关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的担忧，不无道理。依笔者之见，林在这里提出的“党的团结和相当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问题”，是因陈伯达问题无辜牵连至李雪峰、郑维山有感而发，所涉不仅包括黄、吴、叶、李、邱和林自己，还应包括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韩先楚等一批高级将领以及汪东兴等人。林敢于表达不同意见，敢于对“乱命”说不，诚为难能可贵。惟林此等言论，不啻是与虎谋皮。

林信中“建议将三十八军调离华北”，表面上是避嫌，其实是直接宣示了对毛的不满。三十八军是毛手上打击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的有力工具，正如毛所称，“我捡了两块石头，一是三十八军的报告，砸了一家伙，这一下子与陈伯达划清了界限。这块石头，我砸出去以后，起了一些作用。……三十八军做了很好的调查研究，他（指陈伯达——原编者注）讲了几次话，文件在那里，都清清楚楚。”<sup>1</sup>林明知毛所好而欲要其弃之，明知事不可为而言之，以林对毛了解之深，为什么他还要这样说？笔者认为，这恰恰反映了林最后对毛的抗争心态。毛、林走到此时，裂痕不可愈合，已是必然。■

<sup>1</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页374。

【专稿】

## 出逃的林彪专机为什么要带油迫降？

——兼谈蒙古对中国三叉戟飞机坠毁事故调查报告的解读

蒋健

林彪三叉戟专机的坠毁原因和过程是45年前发生的“九一三事件”留下的重大谜团之一。

事实上，中国领导人在9月14日下午确知林彪专机坠毁后就开始探究其坠毁的原因了。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回忆：1971年9月14日下午我把林彪专机在蒙古坠毁的“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sup>1</sup>

时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回忆：9月15日（笔者注：应为9月14日<sup>2</sup>）晚上，周恩来在告知林彪专机坠毁后，“又问我三叉戟飞机的情况，我说，那是巴基斯坦民航转卖给我们三架（笔者注：应为四架）三叉戟飞机中的一架，刚刚改装出来，准备作专机用的。看样子飞机是想在温都尔汗迫降而没有成功，起火烧毁的。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副驾驶和通讯员，只有潘景寅一个人，他没有飞过蒙古的机场，又是个政治干部，平时飞夜航少，缺乏经验，所以飞机必然会摔掉。”<sup>3</sup>

这也就是说，吴法宪是解释林彪专机坠毁原因的第一人。当然，吴法宪完全是凭直觉

<sup>1</sup>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212页

<sup>2</sup>《周恩来年谱》483页记载：9月14日“傍晚，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通报林彪等人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在会上分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

<sup>3</sup>《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869页

判断飞机是先迫降后着火的。

9月22日，北空司令员李际泰根据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带回来的飞机失事现场照片、现场示意图等图片、文字资料以及孙一先的汇报材料，“认为：飞机可能是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清楚着陆区域的地面情况，最好的选择是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冒险以飞机肚皮擦地降落。看来，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肚皮与沙土冲磨，骤然间升温引起油箱着火，从而导致整机爆炸。从当时特殊情况看，驾驶员技术很好，选择了唯一的处理办法。”周恩来则依据李际泰的分析做出了飞机“自行坠毁”的判断。<sup>1</sup>

10月1日清晨，在空军专机师西郊机场办公区，空军参谋长梁璞在孙一先对飞机坠毁爆炸的初步分析后，表示：“飞机迫降时可能速度较快，又向右倾斜，肚皮和右翼尖同时着陆，猛擦地面一震可能就飘了起来，所以擦地痕迹不见了。”“这种飞机机翼和腹部都有油箱，因为机翼较短，主要油箱在腹部，一擦地皮油箱必然着火。”<sup>2</sup>

10月3日夜里，也就是在听完《中共中央(1971)第57号文件》传达的当夜，孙一先把其二十天的印象联缀起来，感到莫名其妙的三叉戟坠机之谜基本上解开了，即：“林彪的阴谋败露，他们一家三口仓皇出逃，乘‘三叉戟256号’飞出国界，目标是苏联的伊尔库次克。飞至蒙古的温都尔汗东北，油料不够了，只得迫降。他们明知带油迫降有机毁人亡的危险，但在蒙古国境内，到处可能有防空武器，不敢为了把油耗尽而在空中盘旋太久(按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256号’在空中要把油耗尽，至少得盘旋20分钟)。迫降前他们做了准备，每个人都脱掉鞋，拿掉身上的硬东西，飞机冒着极大的危险带油迫降，这就注定了他们无法逃脱死亡的命运。果然，飞机擦地着火，来不及打开紧急出口放下充气滑梯，瞬间飞机爆炸，机身裂成碎片，人被抛向高空，恰巧草地枯黄，一燃即火势凶猛，有的人即使摔昏而未死，也逃不脱这炼

<sup>1</sup>孙一先：《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58页

<sup>2</sup>《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164-165页

狱般的草地大火和一氧化碳中毒。”<sup>1</sup>

总而言之，最初的知情者都判断林彪专机是先迫降后着火，虽然李际泰同时提到“不能排除机件失灵，或被地面防空武器击伤而紧急着陆”，但他又说“这些可能性较小。”<sup>2</sup>

## 空军专家组的正式调查结论

在孙一先把林彪座机坠毁现场的照片带到北京后，周恩来就指示吴法宪在空军组织专家彻查林彪专机坠毁的原因。据原空军司令员王海（时任空司军训部第二部长）的回忆：

“吴法宪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之一，他被隔离审查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十几天以后。在吴法宪被隔离审查前几天，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见面后他对我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给了他一些照片，叫他在空军组织一些专家，根据这些照片分析一下，林彪的飞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被外部炮火击落的呢，还是发生过机内搏斗？究竟是什么原因坠落的？照片有好几十张，在他的办公桌上摊了一大堆。”“于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这项任务。这个空军专家组的成员还有当时的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荣、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季南、王涛和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金华。后来，公安部的几位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sup>3</sup>

经过七个多月的努力工作，以王海牵头的中国空军专家组于1972年5月19日给出的正式结论是：“我们根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破碎烧毁的。”“当时256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这架飞机是仓促起飞，准备工作不充分，没有加满油料；在外逃时该机又长期在2500-6500米高度飞行，低中空飞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点前后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进行野外降落。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

<sup>1</sup>《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167-168页

<sup>2</sup>《在大漠那边——林彪坠机真相》，158页

<sup>3</sup>王海：《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事件》，湖南文史，2001年4期，42-43页



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sup>1</sup>

此后，中国官方史书在谈到林彪座机坠毁时都沿袭了空军专家组的这个调查结论，比如，2011版的《毛泽东传》就是这样说的：“当‘三叉戟’飞机飞临温都尔汗上空时，因油料不足，机上又没有领航员和报务员，不得不就地迫降。迫降时因机身擦地起火爆炸，机上人员全部死亡。”<sup>2</sup>

### 对中国官方结论的种种质疑

不过，前苏联和蒙古的一些知情者并不认同中国官方的结论。

分别担任澳大利亚广播电台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驻北京记者的汉纳姆和劳伦斯，从1993年5月开始，历时半年，往返数万公里，走访了蒙古、俄罗斯、美国等地，靠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揭开了让西方人信服的林彪之死内幕。<sup>3</sup>根据汉纳姆和劳伦斯的调查，“飞机坠毁的原因让人费解。中国人声称是飞机油料用尽。扎格沃兹丁（参与调查的前克格勃将军）深深不以为然。他说苏联的结论是飞机有足够的油料可飞抵苏联城市伊尔库茨克或赤塔。有人认为如果飞机油料用尽，地上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火。然而，扎格沃兹丁和当时的蒙古的外交部副部长额德毕力格也坚持说，飞机不是被击落的。扎格沃兹丁猜测该机驾驶员可能为躲避雷达而低空飞行，因而误判高度而致坠毁。但贝尔赫茨石矿的证人们则坚持，飞机在坠毁前就已起火。”比如：“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杜卡加汶·丹吉德玛正守候着蒙古东部靠近贝尔赫的茨石矿的炸药库，当时涡轮发动机的哀鸣声引得她仰望夜空。丹吉德玛现住在贝尔赫一个毛毡制成的帐篷里，她回忆说，不久‘我看到那架飞机在坠落时飞机尾部起火。从我所处的地方，我能够一直追踪那架飞机直到它坠毁的地方（9英里远）’。这架机翼上标有中国民航256号的字样的英制三叉戟1E飞机就这样结

<sup>1</sup>王海：《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事件》，湖南文史，2001年4期，43-44页

<sup>2</sup>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2571-2572页

<sup>3</sup>李安定：《林彪头骨今安在》，《湖北档案》，2004年11期，34-35页

束了它的飞行。”<sup>1</sup>

在汉纳姆和劳伦斯的报道问世三年多后，中国《环球时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在1997年10月16日采访了林彪专机坠机现场的另一个目击者拉哈玛，并做了如下报道：拉哈玛大娘“原来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3公里”的地方，她“今年67岁，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灰色蒙古袍，头上围红色头巾，右眼不好。她的老伴已去世了。提起‘九一三事件’她摇摇头说：‘那是可怕的夜晚。’拉哈玛大娘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0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天，第二天出事地方人少，当地老百姓保护了现场。在飞机坠毁地方，一片废墟，还冒着青烟。机上9人全部死了。”<sup>2</sup>

显然，无论是丹吉德玛，还是拉哈玛，都说林彪专机是先着火后坠落的。

值得注意的是，“九一三事件”发生时任空军专机师师长的时念堂也对空军专家组的结论表示了异议，或者说对三叉戟飞机带油迫降提出了疑问，他说：“根据我们的测算，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落地爆炸前，油箱里至少还有2500公斤的存油，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飞了？为什么要在中途的蒙古国降落呢？这又是一个系列之谜：一、难道是机组人员和林彪一家闹翻了，他们自行降落的么？如果是这样，那么，林彪一家在降落前把手表、鞋子都脱掉了（这是准备迫降的行为），又怎么解释呢？二、难道是林彪一家要求飞机降落的么？飞机上还有存油，还能继续前飞，他们为什么不继续叛逃了呢？三、带着这么多的存油就要在野地里自行降落，明知有危险，为什么还要进行呢？难道有人要同归于尽么？

<sup>1</sup>Peter Hannam, Susan Lawrence: <Solving a Chinese Puzzle——Lin Biao's final days and death>,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1994/01/23; 相关引文采用丁凯文的译本

<sup>2</sup>敖其尔：《今日温都尔汗》，《环球时报》，1997年11月23日，第1版

四、飞机这种带油降落而爆炸的结局，是林彪的主意么？”<sup>1</sup>

### 康庭梓认为拉哈玛看到的“飞机失火”是着陆灯的灯光

康庭梓是林彪三叉戟专机的第二副驾驶，他在2002年撰文认为：拉哈玛“大娘看到飞机上的大火，不是真正的飞机失火，而是飞机上的灯光”。三叉戟飞机“两侧机翼下面高达800瓦功率的两个着陆灯在夜间才能给人以‘着火’的感觉。晚上飞行时，飞机对正跑道时将灯放出来，在高度降落到离地面60~70米时，将灯打开。此时，包括前起落架上的灯光，合成一道很强的光柱，直射地面。飞行员就是利用这些灯光照明，凭自己的视觉判断，操纵飞机降落在预定地点。这个由三点合成的强烈光柱，在地面看来是很亮的。此时，在地面观察飞机时，只能看到一片灯光，而看不到飞机的轮廓。远离机场的牧民大娘，从未见过夜间飞机落地时的情景，把强烈的灯光看作大火是很自然的。”<sup>2</sup>

### 京城孤魂对康庭梓“着陆灯的灯光”之说的质疑

笔者的好友京城孤魂是一位“九一三事件”的独立研究者，他于2005年年初，针对康庭梓的说法发文指出：“首先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使用‘大娘’这个词很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拉哈玛是年老眼花，见识不广，从而很容易把灯光看成火光。在康文的插图中，也把拉哈玛画成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年妇女形象。然而要提醒大家的是，在1971年，拉哈玛不过是一个41岁的中年妇女，正值壮年，眼力和见识不会差到那种分不清灯光和火光的地步。三叉戟的着陆灯在飞行中是折叠在机翼内部的。笔者从熟悉三叉戟结构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个着陆灯倒是可以在起落架没放下的时候就打开，只是飞行速度不能超过400公里，不然会损害灯具。这种着陆灯是采用聚光灯效果的，其下射角度大约在8-9度左右，而且只是向前方照射，照射面积有限。人们都有在夜间被汽车大灯照射过的经历，在汽车正前方会觉得灯

<sup>1</sup>时念堂，孙焕英：《历史将揭开林彪案件的更深层面》，《民主与法制》，2005年3期

<sup>2</sup>康庭梓：《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之三：林彪座机是如何从天上“掉”下来的？》，《航空知识》，2002年4期，35-36页

光刺眼无比，可只要角度偏一些，在汽车旁边，灯光强度就会立刻减弱，就不用提在汽车后面，根本就看不到车灯了。汽车大灯还考虑到驾驶员在夜间要分辨近在眼前的路边标志，因此特意加了部分散光效果，使灯光能够照到路边的交通标志。而在飞机上就无此必要了，全部灯光都可以集中到照射飞机前方的着陆区域。因此只有当拉哈玛在飞机前面的一定范围内，才能看到那刺眼的灯光，而当在飞机侧面和后面时，就不会看到着陆灯的‘火光’了。256不是直升机，不可能长时间停在一个部位，也就是说，即使拉哈玛看到着陆灯光，也只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种一闪即过的灯光竟会被一位正常的中年妇女看作是长时间燃烧的火焰，康庭梓的想象力真够丰富的。”<sup>1</sup>

### 康庭梓说法的另一个不合理之处

康庭梓在2002年的文章中还分析说：“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飞机带着大火在空中飞行20分钟，最后又按场外迫降的程序进行降落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sup>2</sup>而且，康庭梓在十一年后仍然坚持他当初的说法<sup>3</sup>，比如，他说潘景寅在建立落地小航线的过程中，“256飞机落地前肯定不止一次飞过大娘家的上空，飞机声把大娘吵醒的那次，与大娘穿好衣服走出来看到的飞机不是同一次。当时飞机的飞行速度至少每小时400公里，等大娘起床后，飞机早已过去了，等她发现着火的飞机时，已经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经过。”<sup>4</sup>

然而，根据蒙古广播电台9月29日17时播发的《关于中国飞机失事》的消息，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喷气式飞机一架，今年9月13日凌晨1时55分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在深入我国领空飞行时，于2时25分在肯特省依德尔默格，由于不明原因坠毁”<sup>5</sup>来看，飞机在蒙古上空总共飞行了30分钟。如果飞机为了建立落地小航线而盘旋20分钟，那么

<sup>1</sup>京城孤魂：《是谁干掉了“256”专机》，《强国军事纵横》论坛，2005年1月17日

<sup>2</sup>康庭梓：《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之三：林彪座机是如何从天上“掉”下来的？》，《航空知识》，2002年4期，36页

<sup>3</sup>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217-222页

<sup>4</sup>康庭梓：《真相：专机副驾驶亲历“九一三”》，221页

<sup>5</sup>许文益：《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二）——视察林彪机毁人亡现场和对外交涉》，《世界知识》，1988年2期，14页

除去这个盘旋时间，只有10分钟的有效飞行时间，而中蒙414号界碑距离坠机地点不到400公里，这意味着三叉戟当时的飞行速度达到了2000公里/小时以上。然而，三叉戟1E型飞机在27000英尺（8229.6米）高空时的巡航速度为522节（966.744公里/小时），在32000英尺（9753.6米）高空时的巡航速度为502节（929.704公里/小时）。<sup>1</sup>此外，由于低空的空气密度高，也就是空气阻力大，飞机的时速会明显降低，因此结合三叉戟1E的性能与林彪专机的飞行时间和距离来看，笔者认为，根本不可能出现康庭梓所说的潘景寅按部就班花了20分钟建立落地小航线的那种情况。

### 中国官方两年首次公开披露一条支持“先着火后坠落”的证据

2013年12月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载述：1971年9月13日晚上，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报送有关文件时“还说：‘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后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所附情报是空军司令部的工作报告，内称：九月十三日十八时零四分，蒙古国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作战飞机在温都尔汗东北方向六十公里处**着火掉下来了**，按照国防部长命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sup>2</sup>

这是官方权威史书首次正式承认：中国军方最初获得的情报表明林彪专机是在空中着火之后坠落的。

而在此之前，官方史书所披露的蒙古情报都是经过“修正”的，即：坠落在前，着火在后。比如，1997年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上的相关载述为：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以上工作情况，并附送空司一份获悉蒙古温都尔汗地区一军用飞机**坠落起火**的电文。”<sup>3</sup>该载述甚至没有提供情报的来源和截获的时间。2003年出

<sup>1</sup><Evolution and Basic Design Philosophy: Background to the Requirement for a Short/Medium-Range Airliner, Versions of the Trident and Selection of Basic Configuration>, Aircraft Engineering and Aerospace Technology, Vol. 36, Iss: 6, p159, June 1964

<sup>2</sup>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405-406页

<sup>3</sup>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482页

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提供了情报的来源和截获的时间：“当晚二十二时十五分，空军司令部送来报告：十八时零四分，蒙古雷达团团长向所属各连发报说：凌晨二时半有一架不明飞机在温都尔汗地区**坠落焚烧**，因此，从十八时起进入一等戒备。”<sup>1</sup>2011年修正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维持了这个说法。<sup>2</sup>

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过《周恩来年谱》编写的高文谦在其海外出版的《晚年周恩来》中则是这样说的：“九月十三日夜，已经忙碌了一昼夜的周恩来在应变部署大体就绪后，仍不敢休息，又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各方面情况。他知道毛对林彪出逃一事虽在表面上故作豁达，实际在精神上受到重创，为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急于想知道林彪的下落。为了多少让毛宽一下心，周特意附送了空军司令部刚刚获悉的一份关于一架不明军用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降落起火**的报告。”<sup>3</sup>也就是说，高文谦沿袭了《周恩来年谱》中“**坠落起火**”的说法。

那么，空司这个飞机“着火掉下来了”的报告到底是经谁批准后报送给周恩来的呢？无论是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还是被周恩来临时派到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没有提到。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这个报告就像没有出现过一样。除了用它来宽慰过毛泽东之外，周恩来在接到报告后不仅没有让中国外交部马上通知许文益这件事，而且在孙一先回国汇报时也没有向他提过这个报告；当然，周恩来在对坠机事件定性时也同样对此置若罔闻；此外，李际泰、梁璞、王海等空军领导和专家们在分析坠机事件时也未曾考虑过这个报告。令人感到更加蹊跷的是，中国官方后来对该报告长期秘而不宣，而且最初公开该报告时还做了“修正”。

不过，笔者认为，《毛泽东年谱》上“**着火掉下来了**”这条还原本真的证据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94年1月和《环球时报》1997年11月所提供的证据更为重要也更为

<sup>1</sup>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602-1603页

<sup>2</sup>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2570-2571页

<sup>3</sup>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2003年

可靠，因为中方获得这条消息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当天的事情，雷达团团长又是蒙古官方专业人士，他通报的信息显然是现场目击者通过正式渠道报告上来的；而丹吉德玛、拉哈玛都是民间人士，她们关于飞机着火后坠落的说法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20多年之后才为国人所知。

另外，雷达团团长的这个通报还证明蒙方在和中方的会谈中撒过谎，因为中方许文益大使当时曾经问蒙方代表：“附近居民是否听到飞机轰鸣声？是否看到空中着火的物体？”蒙方桑加上校回答：“都没有听到和看到。”<sup>1</sup>

### 支持林彪专机是先着火后迫降的新证据

蒙古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于1971年10月4日委任了一个九人调查委员会，旨在于1971年10月8日至10月18日期间，对9月13日在蒙古境内坠毁的一架中国飞机（笔者注：即林彪专机）的出事原因及其飞行使命，进行辨认及鉴定工作，该调查委员会于1971年11月20日完成《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蒙古的这个调查报告已经解密，最近，著名文革史家余汝信先生在托人将其全文翻译、整理成中文的基础上，还发文对该报告进行了解读。<sup>2</sup>

该报告明确提到：三叉戟飞机“着陆前没有放下起落架及轮子，而且襟翼和着陆灯也没有打开。”<sup>3</sup>这意味着，康庭梓关于拉哈玛把着陆灯的灯光看成大火的说法不攻自破。

当然，至于是否可做出飞机带火降落的判断，光有雷达团团长、拉哈玛、丹吉德玛等人证还不够，如果有物证，也就是在飞机落地点的草地上有过火的痕迹，我们才可以充分相信他/她们的说法，才能完全判断飞机确实是带火降落的。

众所周知的是，孙一先在叙述飞机着陆痕迹时是这样说的：“这里没有着火，整齐完

<sup>1</sup>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28页

<sup>2</sup>余汝信：《蒙古官方调查报告中的九一三事件》，《南方周末》，2016年3月31日，副刊E29

<sup>3</sup>余汝信收集整理：《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e2c94500102wxpo.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15e2c94500102wxpo.html)

好的草地上，有一道由北向南被擦平压实的草痕，长约二十九米，宽约二米多，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呈‘S’形的曲线。在这条被擦压的草地右（西）边不远，有一道平行的槽沟，深约二十厘米，翻倒的草根露出沙土，这大约就是桑加上校说的机翼擦地的痕迹。再往前看，擦压草地的痕迹奇怪地消失了，又是深可没膝的枯草。继续前行约三十多米，才开始进入大片焦土的失事现场。这些迹象更加证明，飞机不是在空中着火摔下来的，而是在盆地中央以肚皮擦地着陆的，机身似乎失去了平衡，倾斜触地。但是，为什么擦压草皮的痕迹不见了？难道飞机又腾空了？那么又是怎样落地爆炸的？”<sup>1</sup>

然而，蒙古官方的调查报告则明确提到：“坠机地点的土地植被遭破坏，植物被损毁的状态，从飞机坠落点向南呈三角形，燃烧范围伸延至29米，飞机残骸散布四周……”<sup>2</sup>

对比孙一先的叙述和蒙古官方的调查报告，两者最大的相同点在于飞机迫降后在地面滑行了29米（然后腾空）；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孙一先说从着陆点开始的29米滑行区没有着火痕迹，而蒙古官方的调查报告则说，从飞机一接地起，草地就开始燃烧，燃烧区域呈三角形，有29米长。

笔者认为，蒙古的调查报告更为可靠，因为该调查委员会的人员多次到现场勘察，而且部分委员还邀请苏军技术人员在10月19日再次前往考察飞机坠毁现场。至于孙一先，并非专业人士，难免出现观察不细和记述有误的问题。

简言之，既有蒙古雷达团团团长、拉哈玛、丹吉德玛等人证，也有飞机坠落点处燃烧的草地的物证，因此可以判定林彪座机是先着火后迫降的。

### 潘景寅带油迫降有错吗？

蒙古的官方调查报告还提到：“该编号为256之三叉戟1E型飞机的坠毁原因，是由于飞行员所犯的错误所造成。”“坠毁前该飞机航速为500-600公里/小时”。“飞机坠毁在

<sup>1</sup>孙一先：《在大漠那边》，115页

<sup>2</sup>《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



大范围内引起爆炸和燃烧，爆炸后的燃烧持续了很长时间，这证明事故发生时，该飞机仍然携带足够燃料可以继续飞行。”“事故发生时的那一瞬间，飞机引擎仍然在全速运行，并没有损坏（引擎没有燃烧过或被损坏的迹象）。”<sup>1</sup>

显而易见，蒙古方面将林彪专机的坠毁归咎于飞行员的操作失误：一是不该带这么多油就迫降；二是迫降时的航速太高。如果联系到蒙古方面误以为三叉戟 1E 型飞机的正常巡航“航速为 680 公里/小时”<sup>2</sup>，500-600 公里/小时的迫降航速确实会让蒙古调查人员觉得匪夷所思。

笔者认为蒙方的调查报告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一是蒙方完全不知道林彪专机仓皇出逃的背景；二和蒙方进行事故调查的目的有关，即“就中国军用飞机未经批准而侵入我国领土一事，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抗议”<sup>3</sup>，他们不想节外生枝，所以尽管该调查委员会自称“参考了当地目击者关于该飞机飞行状态的陈述，当地坠机现场的报告”<sup>4</sup>，但其报告中却丝毫没有飞机是“着火掉下来了”的痕迹。

那么，身为中国一流飞行员的潘景寅为什么在飞机拥有足够燃料可以继续飞行时要带油迫降呢？

笔者认为，这和潘景寅已经感知飞机某处已经着火有关。

然而，从飞行技术的角度看，飞机必须在距离降落点一定的距离之前就得作降落的准备工作，这样才能保证飞机在降落点上准确落地。而潘景寅只有在低飞通过整个一片场地之后，才能判断这片场地是否适合迫降：如果不适合，继续前飞寻找；如果适合，则掉头，调整航向，进一步仔细观察，为迫降做好准备。

三叉戟 1E 飞机正常降落需要的跑道长度为 5440 英尺（1658 米）<sup>5</sup>，没有飞过蒙古机场的潘景寅显然不会指望在深夜找到具备这种条件的机场。不过，经过长距离的低空飞行，

<sup>1</sup>《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

<sup>2</sup>《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

<sup>3</sup>《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

<sup>4</sup>《关于一架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坠毁原因的调查报告》

<sup>5</sup>"Evolution and Basic Design Philosophy: Background to the Requirement for a Short/Medium-Range Airliner, Versions of the Trident and Selection of Basic Configuration", Aircraft Engineering and Aerospace Technology, Vol. 36, Iss: 6, p159, June 1964

潘景寅终于发现一片适合迫降的场地，它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盆地，平坦坦的像是人工铺成，南北长三千多米，东西宽约八百米。”<sup>1</sup>正如梁璞事后所评论的那样：“那天午夜没有月亮，能找到这么块平地野外降落，难度是相当大的。”<sup>2</sup>笔者认为，潘景寅在权衡各种因素，包括飞机某处已经着火，并与林家人，比如叶群，商量之后，选择就在该处实施迫降。

三叉戟 1E 配备了自动驾驶仪 (autopilot)、自动着陆仪 (autoland) 和自动拉平仪 (autoflare, 一种在飞机准备降落时能使机身自动与地面平行的装置)。如果在机场正常降落，在飞机高度 (elevation) 150 米、地平方向 (azimuth) 离跑道着陆点 3000 米时，就可打开自动着陆仪，由飞机自动完成拉平和降落动作。当然，为了完成自动拉平和自动着陆动作，除了机载的设备外，还需要在机场的地面跑道上安装有定位信标和下滑道发射机 (LGS)、精密进近雷达 (PAR)、高强度跑道边线灯光 (HIRL)、高强度进近灯光 (HIAL) 等设备。<sup>3</sup>

尽管三叉戟 1E 上的自动驾驶仪在飞机的爬升、巡航、下降以及进近到离地面约 60 米之前的各个阶段都可以发挥作用，这可以解释只有不懂飞行和飞机知识的叶群一个人陪坐在驾驶舱时潘景寅仍然可以自如操控飞机的原因，但是，显而易见，在野外迫降，三叉戟飞机上配备的自动着陆仪完全派不上用场，潘景寅只能靠目测地面物体进行决断。

从拉哈玛描述的“羊群惊散，马嘶狗叫”来看，当时潘景寅是在很低的高度上寻找和观察迫降场地；从拉哈玛描述的“从西南向北飞过来”、“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来看，潘景寅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迫降场地，所以才飞返回来准备迫降。

如果潘景寅认为他看到的地面物体构成“足够的目视参考”，那么他就会根据此时的

<sup>1</sup>孙一先：《在大漠那边》，105 页

<sup>2</sup>孙一先：《在大漠那边》，164 页

<sup>3</sup>"Automatic Land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Requirement for Autoflare for the Trident, a Description of Smiths SEP.5 Flight Control System and Typical Operating Instructions for Approach and Landing", Aircraft Engineering and Aerospace Technology, Vol. 36 Iss: 6 pp. 160 - 165, June 1964

无线电高度（RA）来确定决断高度，比如 150 米，然后向接地带（touch-down zone）进近，而是否着陆的决断是在进近过程中一直进行的。

然而，潘景寅既是在夜里又是在陌生地域实施迫降，他不可能在决断高度处靠目测看清（3000 米外）迫降场的地貌细节，所以不得不预留部分燃油以防万一，比如在进近过程中，突然看清此前没看清的小土包之类障碍物，那么他就要中断进近，将飞机再度拉起来，重新寻找更合适的着陆点。因此，笔者认为，潘景寅明知尚有一定存油，仍然决定实施迫降。

至于潘景寅为什么不在确认该处为合适的着陆点之后，再拉上去复飞一圈把油尽可能耗尽再回到原地着陆，笔者认为，除了在茫茫草原上本来就很难建立着陆所必需的目视参考，潘景寅在技术上也没有在黑夜及陌生区域准确飞回原地的把握之外，此时飞机上的火越烧越大，已经容不得他再在空中盘旋耗油，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冒险带油迫降……

## 天遂人愿乎

林彪专机最终迫降失败，只能说是在劫难逃！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说是天遂人愿，既遂了林彪、叶群一年多前发出的“发不同青心同热，生少同衾死同穴”、“教诲恩情永不忘，他年定随到黄泉”之愿，也遂了毛泽东的“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之愿，因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林彪问题”了<sup>1</sup>。

而在“九一三事件”中“为党立功的”<sup>2</sup>林彪、叶群之女林豆豆获悉父母这么死亡的第一反应则是：“他们自绝于人民，罪有应得。”<sup>3</sup>■

2016年2月初稿

2016年5月终稿

<sup>1</sup> 《邱会作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788页

<sup>2</sup>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中发[1971]57号，1971年9月18日

<sup>3</sup> 谢静宜：《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65页

【评论】

## 林彪与抗美援朝的那些事

蒋健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先生在一篇关于文革高层人物研究的文章中曾经这样评论抗美援朝决策阶段的林彪以及国内史学界对该阶段林彪的研究：

“从‘史实重建’的学术要求来看，‘千秋’这篇翻案文章的失据硬伤太多，可以说是满目疮痍。比如关于出兵朝鲜的问题，中央高层的决策过程非常复杂，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是犹豫再三，前后多有反复。直到决定出兵的前一天，毛泽东还给斯大林打电报，表示中国不出兵。林彪也是这样的情况。但在中共中央决定出兵后，即派周恩来和林彪为代表到苏联与苏方洽谈有关作战的具体事宜。这说明林彪与中央态度是一致的。至于说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的罪名，这是文革中批判林彪的政治需要。关于林彪对出兵的态度，襄赞赴朝军务的情况，著名学者沈志华先生已写有文章，前后过程讲的很清楚。‘千秋’直到现在仍然还拿文革中的批林材料做翻案文章，这是很不着调的。说明作者还没有走出文革。”<sup>1</sup>

因为感到王海光先生的上述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史实，所以笔者特意去查了“千秋”的文章《倾听历史的声音——评林彪事件》，其中被王海光先生点评的段落如下：

“一提到抗美援朝历史，许多国人对林彪的印象就是怯战怕死。有什么根据呢？都来自中共的教科书。一是林彪反对参战，二是林彪称病不接帅印，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种种绘声绘色的故事。而从现在中共披露出来的史实来看，当时中共高层的绝大多数都不主张卷入韩战，本来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决策前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激烈是非常正常的事，不表态或含糊其词的人才不正常。何况林彪的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没错。中共的史书，长期以来，绝口不提其他人反战，而只突出林彪，又将林彪的反战，归结为他怕美国（实际上

<sup>1</sup> 王海光：《答客问：谈谈文革高层人物的研究》，《记忆》136期，2015年7月31日

当年林彪反战的主要理由，同其他人一样，是认为不符中国利益），这就不正常了。按中国人的传统简单思维，不管三七二十一，主战的是民族英雄，不主战则汉奸卖国贼，林彪的形象可想而知了。至于林彪不接帅印，能有什么奇怪的呢？林彪在韩战前韩战后都一直在养病，内战末期他就已病倒，不是中央决定出兵才称病的，建国后他已完全脱离了军队指挥。这样的身心状况，能不能迅速投入一场突如其来而又陌生的大战？林彪于国于己，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中央本就不应该派他出马。当时中共军中不是没人，林彪也不是假病，为什么就不能推辞？同样称病的粟裕，韩战爆发前倒是一直积极准备对台渡海作战的部署，他也不上朝鲜战场，可从没有哪一本史书斗胆质疑过他的病，这公平吗？”<sup>1</sup>

笔者感觉，除了“建国后他已完全脱离了军队指挥”这句话不符合史实外，“千秋”的史评并无过分之处，反倒是王海光先生对他的指责很不着调。

### 文革后的官方史书怎样描述决策出兵朝鲜时的林彪？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不妨看看文革结束后的中共史书是怎样描述当时的林彪：

1980年代初出版的《聂荣臻回忆录》是这样描述的：“毛泽东同志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奇怪得很，过去我们在一起共事，还没有看到他怕死到这个程度。”<sup>2</sup>

在《聂荣臻回忆录》出版后的很长岁月里，官方史书和文章谈到这个话题时基本上都是这个腔调，比如《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sup>3</sup>就直接采信了聂荣臻的说法，有的研究者虽然用语委婉，但也说：10月2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笔者注：应为书记处会议）。会上常委们对出兵援朝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毛泽东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并在会前考虑由林彪率军入朝。林彪认为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

<sup>1</sup> 千秋：《倾听历史的声音——评林彪事件》，电子刊物《往事》26期，2005年11月18日

<sup>2</sup>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36页

<sup>3</sup>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第2版

而我们1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引火烧身，其后果不堪设想。林彪从心眼里反对出兵朝鲜，他以生病为由，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重托。因此，当会议讨论到援朝志愿军的司令员人选时，毛泽东说：“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合适了。”他的话音刚落，朱德早已憋不住了，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于是，常委作出了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的重要决定。<sup>1</sup>

这种状况直到2000年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史》才有所改变，该书一改过去林彪反对出兵并装病的说法，明确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考虑志愿军挂帅人选时，因为“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sup>2</sup>，所以才改为彭德怀出马。

那么，“林彪托病推辞”之类的说法是否从此绝迹了呢？显然不是！比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仍旧写道：“10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毛泽东便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sup>3</sup>又比如，军方著名史学家徐焰的著作《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是这样写的：“当时中央领导人普遍感到，解放战争期间林彪长期在东北指挥作战，已加入东北边防军的4个军都是四野的部队，朝鲜的地理条件又与东北近似，让他出征挂帅比较合适。然而林彪不主张出兵朝鲜，又声称有病，到朝鲜住阴暗的山洞掩蔽所受不了。1949年秋四野部队南下中南地区时，他确实生病躺倒，以后一直不能正常工作，这时又要求去苏联医治。当时代理总参谋长的聂荣臻，从红军时代起就在林彪身边任政委，抗战初期又一起共事，此时也感到奇怪，说与他共事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林彪这么怕死过。后人如严格讲来，这其实正是夺取全国胜利后一种贪图享受和思想堕落的表现。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不愿接受指挥入朝部队的任务，毛泽东

<sup>1</sup> 晓勇：《毛泽东对出兵抗美援朝问题的四次决断》，《党史文汇》，1997年9期，3页

<sup>2</sup>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159页

<sup>3</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4页

随之就考虑到担任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区司令员的彭德怀。”<sup>1</sup>

上述两篇材料都出现在2003年，也就是文革结束的20多年后，而“千秋”先生的文章则发表于2005年，由此可见，王海光先生关于“‘千秋’直到现在仍然还拿文革中的批林材料做翻案文章”、“说明作者还没有走出文革”的评论是多么的不着调！

就笔者管见所及，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而出版的《解读抗美援朝战争》依然说“林彪以身体不好为由不肯受命，拒绝挂帅”。<sup>2</sup>2010年版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还在说：毛泽东“原拟派林彪率兵入朝，**林彪托病推辞。**”<sup>3</sup>

至于王海光先生推崇的沈志华先生的相关文章<sup>4</sup>发表于2012年，也就是“千秋”文章发表的七年后，即使如王海光先生讲的那样，沈文把“前后过程讲的很清楚”，“千秋”先生在写作时怎么可能读到呢？何况，沈志华先生也认为“毛泽东本来想请林彪挂帅出征，但林彪反对出兵，故称病不出，后中央决定改派彭德怀带兵赴朝作战”是“中国学界和社会长期以来流传着（的）一个说法”<sup>5</sup>。实际上，即便是沈志华本人的著作中也曾经有“毛泽东认为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拟派林彪率军入朝。但是林彪不赞成出兵，**称病推辞**”的描述<sup>6</sup>。

## 周恩来和林彪去苏联时中共中央真的决定出兵了吗？

王海光先生说：“在中共中央决定出兵后，即派周恩来和林彪为代表到苏联与苏方洽谈有关作战的具体事宜。这说明林彪与中央态度是一致的。”

问题是，周恩来和林彪去苏联时，中共中央真的决定马上出兵了吗？至少斯大林不认

<sup>1</sup> 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2月，109页

<sup>2</sup> 姜廷玉：《解读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军出版社，2010年，112页

<sup>3</sup> 逢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4页

<sup>4</sup> 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史学月刊，2012年11期，74-78页

<sup>5</sup> 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史学月刊，2012年11期，74页

<sup>6</sup>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23页

为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出兵，这从10月8日他给金日成的电报<sup>1</sup>可以看出这一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把他与毛泽东的互动交代得很清楚，故摘录于下：

10月1日我致电毛泽东，问他能否立刻派出哪怕是五六个中国师去朝鲜，以便朝鲜同志能在这些师掩护下建立预备队。毛泽东拒绝了，推说他不想把苏联拖进战争，中国军队技术装备差，战争会在中国引起很大不满等。我以下面这封信回复他：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1、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2、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3、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4、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将不仅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计划。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

<sup>1</sup>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386-388页



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这需要害怕吗？我认为不需要，因为我们在一起将比美国和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10月7日我收到了毛泽东的复信，他表示赞同我信中的基本论点，说他将派出的不是六个而是九个师，但不是现在而是过一些时候再派；他要求我接见他的代表而且同他们详细商谈。我当然同意接待并同他们讨论给朝鲜军事援助的详细计划。……关于同中国同志谈判的进一步情况，下次再通报。

斯大林电报中提到的毛泽东的代表，就是毛泽东在10月2日和10月7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两次提及的周恩来和林彪。<sup>1</sup>

关于周恩来、林彪10月11日同斯大林的会谈，同行的中方翻译师哲回忆说：在斯大林简单介绍朝鲜战局之后，“恩来开门见山地讲：中国对一般情况是了解的。特别是考虑和研究了国内实际情况及主观因素，认为以不出兵为宜。原因是中国由于长期战争，连年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许多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现在又卷入战争，不仅人民的困苦生活无法改善，而且国家的经济恢复工作也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担负战争消耗的重担，实在困难。况且军队的武器装备和接济，无不困难重重。战争不是儿戏，陷入这个漩涡，多年摆不脱身，如何收场?! 并且这场战争如果僵持不下，还可能牵涉到各兄弟国家。因而认为不出兵较好。”<sup>2</sup>

显然，周恩来这里说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意见，而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意见。看

<sup>1</sup> 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576-577，588-590页

<sup>2</sup>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495-496页。

过毛泽东2日和7日电报的斯大林当然明白这一点，甚至预想到周恩来会这么表态，所以他“听了以后，说：按目前情况，美军已越过三八线，进入朝鲜北部。朝鲜如果没有后援，至多维持一个礼拜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进行无望的抵抗，最终会被敌人消灭掉，就不如早点主动撤退，以保持所剩的有生力量，以待他日，或许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我们必须把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设想一下，作出全面的估价，制订出具体的措施和对策。”

“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着他们白白牺牲，那就不如马上告诉他们作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武器、物质和工作人员撤到中国东北，而把老弱残废、伤病员大部分撤到苏联境内。之所以要把有生力量撤到东北，是为了以后便于重新进入朝鲜。从中国东北要比从苏联进入朝鲜容易得多。总之，我们两家都得承担起这个重担。建议把我们商谈的这个情况，即撤退的意见，立刻电告金日成，不能拖延时间。”<sup>1</sup>

师哲回忆，当斯大林“讲到这里时，林彪插话说：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应让他们留在朝鲜境内。那里多山、有森林，他们可以进入山沟森林，进行长期游击战争，而且可以转战于朝鲜南北各地，以待时机。”<sup>2</sup>

尽管根据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对林彪的“这个建议十分不感兴趣”<sup>3</sup>，但这个建议不仅是林彪个人的意见，而是毛泽东在10月2日给斯大林电报中“由于暂时的失败，朝鲜可以把斗争的形式改为游击战”建议的自然延伸。

参与会谈的苏方翻译费德林的回忆同师哲的回忆大同小异，他说周恩来在会谈一开始就列举了中国参战的许多困难，并担心中国参战会引发中美战争，尽管斯大林否定了中美战争的可能性，并告诉周恩来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确保在朝鲜半岛北部有一个友好邻邦，但周恩来没有改变看法，周恩来和林彪的态度影响了斯大林，于是斯大林提议中苏共同向朝鲜提出建议，如果朝鲜军队在国内支持不下去，可以撤退到中国东北和苏联，对部队进行休整，并组建新的武装，既然中国同志不打算出兵朝鲜，中苏就应该制定计划帮助朝鲜

<sup>1</sup> 《在历史巨人身边》，496-497页

<sup>2</sup> 《在历史巨人身边》，497页

<sup>3</sup> 《在历史巨人身边》，497页

同志打回去。<sup>1</sup>

从斯大林 10 月 13 日给金日成的“电报内容使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意外。金日成说，对此他们感到难以接受，但既然这样，他们一定执行”<sup>2</sup>来看，师哲和费德林关于会谈结果的回忆是基本准确的。

显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在周恩来、林彪临行前的授权，周恩来不会做出或认同让金日成和朴宪永感到意外和难受的那个会谈决定的。

而且，毛泽东事后也一度追认了那个会谈决定，因为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给毛泽东电报的最后一句就是“等待您的决定”，而毛泽东 10 月 12 日下午 3 点 30 分看到电报后当即表示同意斯大林和周恩来的决定。当晚 10 点 12 分，毛又致电斯大林，告知“已命令中国军队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收到毛泽东电报后，斯大林立即致电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和军事顾问瓦西里耶夫，要他们向金日成通报 11 日联名电报的内容，并特意指出：毛泽东同志同意并赞成这次会议达成的意见。<sup>3</sup>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史实在四个重要当事人 20 年后的一次会谈中得到佐证。

1970 年 10 月，金日成访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分别在 8 日和 10 日两次会见了。他在 10 日的那次会见中，毛泽东对金日成坦承：“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着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周恩来则说：“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sup>4</sup>也就是说，毛泽东承认，当年是毛泽东们动摇在先，斯大林泄气在后，双方才一度决定放弃朝鲜的。

在与金日成交谈这个话题的最后，毛泽东提到了当年最终的出兵决定：“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

<sup>1</sup> 亚力山大·曼绍洛夫：《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来自俄国档案的新证据》，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1995/96年冬季号，102—103页

<sup>2</sup>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390页

<sup>3</sup> 沈志华：《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动机分析》，炎黄春秋，2015年2期，60页

<sup>4</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343-345页

<sup>5</sup> 逢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30-31页

去。……至于苏联那时候不想打仗，也是有理由的。他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损失太大，单是壮丁就两千万。恐怕不单是壮丁，因为妇女不包括在壮丁之内。”<sup>1</sup>苏联不出空军，毛也决定出兵的一个原因，毛对金日成讲了：“过去我曾经同跟着你们军队到过南朝鲜的中国新闻记者谈过话。我问他：究竟美国的炮火和空军杀伤力哪个大？据他说，主要杀伤力还不是空军，还是陆军。我说这样就好办了，因为我们没有空军，有的只是陆军。”<sup>2</sup>

实际上，毛泽东在1950年10月12日收到周恩来和斯大林的联名电报后，就致电彭德怀、高岗以及邓华、洪学智、韩先楚和解方：第13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请高岗、彭德怀13日或14日来北京一谈。12日夜，聂荣臻打电话至安东找到彭德怀，告知：“原定方案有变化，主席命你和高岗明日回京面商。”13日晨，彭德怀乘火车抵沈阳，随后与高岗同乘专机飞北京。<sup>3</sup>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再次开会讨论出兵朝鲜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把中央政治局的新决定电告周恩来：“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sup>4</sup>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这个电报后，很快告诉了正在莫斯科的莫洛托夫并让他转告斯大林，且在当晚与莫洛托夫就军援细节等问题举行了会谈。<sup>5</sup>

斯大林则在10月14日再次电告金日成：“经过犹豫和若干暂时的决定后，中国同志终于做出了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定。我为终于做出的这个有利于朝鲜的最后决定感到高兴。”<sup>6</sup>

显然，无论是周恩来还是林彪都没有参与这个“最后决定”的制订过程，周恩来起初甚至对这个“最后决定”感到很意外。<sup>7</sup>

<sup>1</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373-374页

<sup>2</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372页

<sup>3</sup> 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442-443页

<sup>4</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252-253页

<sup>5</sup> 《在历史巨人身边》，501-502页

<sup>6</sup>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392页

<sup>7</sup> 《在历史巨人身边》，499-500页

那么，对于这个“最后决定”，是否“林彪与中央态度是一致的”呢？笔者另文再讲。

## 沈志华的文章真的把“前后过程讲的很清楚”了吗？

王海光曾经在一篇关于林彪事件研究的综述中称赞沈志华的文章“是将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进行结合的一篇互证研究的范文”<sup>1</sup>。

那么，“关于林彪对出兵的态度，襄赞赴朝军务的情况”，是否真的如王海光先生说的那样，“著名学者沈志华先生已写有文章，前后过程讲的很清楚”呢？

沈志华先生的“林彪不同意甚至反对出兵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林彪用兵一向谨慎，不愿冒险，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因此，在军事局势不利的情况下，林彪不主张中国参战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出兵朝鲜的最初决策过程很复杂，毛泽东要下决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哪里是林彪‘称病不出’，彭德怀‘挺身而出’那么简单”等观点<sup>2</sup>，笔者很赞同。

但是，沈志华先生把林彪未能挂帅出征归结于林彪身体有病的看法，笔者实难苟同。

“关于林彪的病情和治疗情况”，沈志华先生说，“他的司机楚成瑞和秘书关光烈有较为详细的回忆：林彪早有神经衰弱和失眠症，抗日战争期间又被国民党士兵误伤，子弹头卡在骨头缝里，后来到苏联治病，虽取出弹头，但落下了后遗症。内战时期，林彪劳累过度，病情加重，严重失眠、头痛。南下作战尚未结束，便不得不回武汉治疗。1950年3月经中央批准，林彪到北京治病。此时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新病，怕冷、怕水、怕光、怕风，头痛、腰痛、失眠。而且‘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白天进去都要打手电筒。因为怕风，女儿为他跳舞，都要在屋外，林彪隔着玻璃看。林彪平时睡不着，在颠簸的情况下反而容易入睡。于是，楚成瑞就经常开车拉着林彪在石子路上兜圈子，好让他多睡一会儿。林彪治病期间，周恩来、彭德怀、罗荣桓和黄克诚常来探望，周恩来一个月要来一两次。毛泽

<sup>1</sup> 王海光：《30年来林彪事件之研究（下）》，《战略与管理》，2013年第3/4期合编本。

<sup>2</sup> 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史学月刊》，2012年11期，78页

东也很关心林彪，每次林彪去拜访，毛都要亲自送他出门。”<sup>1</sup>

笔者认为，沈志华先生的这段论述很成问题：

沈志华先生歪曲了楚成瑞的叙述。“1950年3月经中央批准，林彪到北京治病”是不假，但紧接着，沈志华就说“此时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新病……”。按照沈的这种写法，“此时”只能被理解成“1950年3月”之后，而楚成瑞的相关叙述说的很清楚，“1953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sup>2</sup>。沈先生文中引述的“怕冷、怕水、怕光、怕风，头痛、腰痛、失眠。而且‘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白天进去都要打手电筒。因为怕风，女儿为他跳舞，都要在屋外，林彪隔着玻璃看。林彪平时睡不着，在颠簸的情况下反而容易入睡。于是，楚成瑞就经常开车拉着林彪在石子路上兜圈子，好让他多睡一会儿。林彪治病期间，周恩来、彭德怀、罗荣桓和黄克诚常来探望，周恩来一个月要来一两次”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楚成瑞说的“1953年春天”之后，而非“1950年3月”之后。笔者认为，沈先生之所以这样说，无非是想强调林彪的身体在中共中央确定挂帅人选之前就非常糟糕了。

至于关光烈，他1959年才来到林彪身边当秘书<sup>3</sup>，所以他对林彪1950年秋的身体状况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 林彪到底是何时病倒的？

根据楚成瑞的回忆，“1953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也就是说，他记得林彪是1953年春天病倒的。

不过，林彪本人说自己是1952年病倒的。1959年9月11日，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

<sup>1</sup> 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史学月刊》，2012年11期，77页

<sup>2</sup> 蒋霞：《我给林彪治“怪病”——访离休老战士楚成瑞》，《南方周末》，2000年11月23日，14版

<sup>3</sup> 迟泽厚：《林彪秘书关光烈》，《南方周末》，[www.infzm.com/content/70109](http://www.infzm.com/content/70109)

讲：“黄克诚，老实说，我不知道，虽然他当总参谋长不是我提的，但是他当后勤部长，我在52年，没有病以前，我觉得调一个人搞那个事情，那是我提的。我觉得他那个人至少是不会贪污的。你管后勤你管钱嘛，至少是节约。好，你看，我犯了多大错误！”<sup>1</sup>

林彪1952年病倒的说法有周恩来1952年7月9日的一封信可以佐证，这封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的信中提到：“彭德怀同志即日起过问军委日常工作，直接向主席和中央负责。……军委其他副主席的分工，除林副主席健康复原以后应多管具体业务并过问全局外，其他各人可只与闻与其工作有关事项，一切常务可不再分担，以专责成。”<sup>2</sup>周信的背景是林彪病倒后由周暂代主持军委工作，但因林彪久病难愈，所以周恩来建议军委日常工作今后由彭德怀负责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

按照《彭德怀传》的说法，林彪是1952年1月病倒的。<sup>3</sup>

不过，依照黄克诚的回忆——“1952年春夏之间，我奉中央调令，交代了湖南省委的工作，仍回军队任职。这年8、9月间，我到北京报到。于10月奉令担任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sup>4</sup>来看，可以估算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是1952年春天提议黄克诚出任总后勤部长的。值得一提的是，因为黄克诚到北京报到并就职的时间恰巧是在彭德怀开始主持军委工作之后的一个多月，所以军内许多人误以为是彭德怀把黄调总部来的。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给黄克诚戴了几顶帽子：“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毛泽东还说黄克诚与彭德怀是“父子关系”。<sup>5</sup>在随后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除了揭批彭、黄的政治问题和亲密关系之外，吴法宪还揭发了黄克诚“贪污”黄金的经济问题，这使得黄克诚很难受。<sup>6</sup>而林彪在9月11日，也就是军委扩大会议闭幕前的讲话中提到黄克诚显然是善意

<sup>1</sup> 王焰：《彭德怀蒙冤前后的100天》，南方周末，2000年7月20日；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

<sup>2</sup> 《周恩来军事文选》（4），人民出版社，1997年，286-287页。

<sup>3</sup> 王焰：《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494页。

<sup>4</sup>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234页。

<sup>5</sup> 《黄克诚自述》，254页。

<sup>6</sup> 《黄克诚自述》，264-265页。

的澄清：黄克诚 1952 年调回军队工作不是彭德怀办的，而是“我在 52 年，没有病以前”办的，因为“我觉得他那个人至少是不会贪污的。”

另外，据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经长期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主要领导的邱会作回忆：“对 1952 年‘三反’中暴露出来的后勤系统的严重问题，林彪向中央提出，‘要下本钱调一批优秀干部到后勤系统充实为领导骨干。’这一建议得到毛主席的采纳，选调了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sup>1</sup>

除了提议把黄克诚调任总后勤部长之外，另有几件事也可证明 1952 年 2、3 月份林彪还在工作：反美军“细菌战”的开始阶段，聂荣臻 2 月 18 日，聂荣臻、粟裕 2 月 20 日和 3 月 5 日，给中央军委领导的有关报告，林彪都是受报人之一<sup>2</sup>；邓华在 3 月份向林彪提交《停战后的志愿军部署及东北今后国防建设问题的建议》，林彪审阅之后转送毛泽东<sup>3</sup>；周恩来 3 月 19 日在聂荣臻、粟裕关于成立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上批示“请林彪同志审阅或约粟裕同志一谈，如觉可行再送主席批办”之后，林彪针对报告中所提的“每班十五至廿人不等”，建议每班的学员为二十到三十人<sup>4</sup>，随后把报告呈报毛泽东，毛泽东 3 月 26 日批办。

从 1952 年 4 月 5 日周恩来在粟裕 4 日向中央军委呈送的《关于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上的批示“上星期六，粟裕同志和我谈了这些问题。我告他本来拟在‘三反’后请林（彪）来主持谈谈这类国防问题，然后提中央讨论。现在林病尚未好……”<sup>5</sup>来看，林彪是在 1952 年 3 月下旬病倒的，因为周恩来批示中提到的“上星期六”是 1952 年 3 月 29 日。

简言之，林彪是 1952 年春天病倒的，这意味着楚成瑞记对了季节，但记错了年份。

<sup>1</sup> 程光：《邱会作家书》，明镜出版社，2014 年，333 页。

<sup>2</sup> 曲爱国：《是美军的罪行还是中朝方面的“谎言”——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反细菌战斗争的历史考察》，军事历史，2008 年 2 期，2-4 页

<sup>3</sup> 罗印文：《邓华将军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年，375 页

<sup>4</sup> 滕叙尧：《陈赓大将与哈军工》，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年，1-3 页；《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年，881-882 页

<sup>5</sup> 《粟裕传》，868-869 页



## 林彪在中共中央决定出兵朝鲜前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

沈志华说林彪的怪病“在当时中国的医疗条件下很难治愈，故多次寻求苏联帮助。据笔者看到的俄文档案，早在1947年9月高岗就向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提出，请求派苏联神经病医生和心血管病专家来为林彪的病情进行诊断。1948年11月，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古谢夫又致函联共（布）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要求为林彪派遣医生治病。以上情况说明，林彪确实有病，而且很严重，很怪异，在中国尚无法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又如何能出国带兵？”<sup>1</sup>

笔者认为，“林彪确实有病，而且很严重，很怪异”是实情，但据此说林彪有病“无法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则言过其实了。

事实上，1948年9月底到11月初，林彪亲临前线指挥了辽沈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五大战略集团中的东北卫立煌集团；1948年12月到1949年1月，林彪又亲临前线指挥了平津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五大战略集团中的华北傅作义集团；随后，林彪又亲率四野大军南下，消灭了国民党军五大战略集团中的华中白崇禧集团。也就是说，林彪当时虽然有病，甚至有重病、怪病，但还没有严重到影响他的领导和指挥工作的程度，这一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是知道的，所以才会在平津战役期间，“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同志组织总前委，**林彪为书记**，所有军事、政治、财政、经济、粮食、货币、外交、文化、党务及其他各项重要工作均归其管辖，以一事权而免分歧。”<sup>2</sup>平津战役结束后，林彪向毛泽东建议由聂荣臻率四野大军南下，聂荣臻则表态可以作为林彪副手一起南征，但毛泽东决定，林彪打到南方去，聂荣臻留在北平。<sup>3</sup>1949年9月，毛泽东又同意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二野在华中地区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的建议<sup>4</sup>，也就是说，当第二

<sup>1</sup> 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史学月刊，2012年11期，77页

<sup>2</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433-434页

<sup>3</sup> 钱江：《建国初期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党史博览，2003年7期，18页

<sup>4</sup> 杨胜群，闫建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 一九〇四——一九七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840页；《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三——一九四九》修订本（下），572页

野战军与第四野战军交汇时，毛泽东决定两大野战军的作战事宜一律由林彪来指挥。还需要一提的是，四野南下前罗荣桓就已经开始休养，四野南下后刘亚楼、肖劲光、程子华这三个兵团司令员陆续被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调离四野，这无疑加重了林彪的工作负担。

此外，1950年3月中旬林彪到北京后并非纯粹治病、养病，也从事了一些重要的工作，比如，和粟裕等人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军事和土改会议<sup>1</sup>，和粟裕等人列席了毛泽东主持的3月27日-4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汇报了中南地区的情况<sup>2</sup>，指挥邓华、韩先楚取得了海南岛战役的大捷<sup>3</sup>。正因为这层渊源，在林彪因病缺席的6月6日-9日举行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期间，粟裕明知林彪有病仍然向毛泽东请求中共中央派刘伯承或林彪主持攻打台湾战役，但毛泽东决定该战役仍由粟裕指挥。<sup>4</sup>6月23日，粟裕再次向毛泽东表示：“职实感能力有限，不堪负此重责，为此请求军委直接主持此一战役或请刘伯承、林彪两同志中来一个主持亦可，职在华东范围内当全力以赴。”<sup>5</sup>显然，了解林彪身体状况的粟裕不认为林彪病到不能主持攻打台湾战役的地步。

实际上，林彪缺席七届三中全会，是因为他当时在山东济南养病，并非因为他病得很严重。林彪在济南期间，并没有脱离工作，比如他对向来济南汇报工作的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和湖北省委副书记刘建勋介绍过经验。<sup>6</sup>

再者，6月下旬，越共领袖胡志明曾经向中共中央请求派一名高级军事指挥员去越南，作为越共最高权力机关的军事参谋。朱德提议派林彪去，但遭到毛泽东的否决，理由是林彪“不能给人做参谋，如果他去了，不是他给胡志明当顾问，而是胡志明给他林彪当顾问。”<sup>7</sup>显然，朱德不认为当时的林彪的身体糟糕到无法履职越南的程度，毛泽东不同意派林彪去越南也不是因为担心林彪的身体顶不住。

<sup>1</sup>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1），101.102，105页

<sup>2</sup>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1），106-111页

<sup>3</sup> 杨迪：《创造渡海作战的奇迹：解放海南岛战役决策指挥的真实记叙》，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185，268，304，310，332页；《李作鹏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350，356页

<sup>4</sup>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1），155页

<sup>5</sup>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粟裕年谱》，2006年，498页

<sup>6</sup> 《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10页

<sup>7</sup> 熊坤静：《陈赓在援越抗法的日子》，文史天地，2009年12期，10-11页

接下来，再看看林彪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些活动：

7月7日下午，林彪出席周恩来主持的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的第一次会议，该会议初步确定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与领导人选。<sup>1</sup>

7月7日晚上，林彪在家中接见当天才到北京履新的吴法宪，赞同刘亚楼提出的“在陆军基础上建立空军”的思路。<sup>2</sup>

7月8日，林彪从北京赶到武汉，在家中和谭政、陶铸一起召见39军军长吴信泉，命令他迅速收拢部队、尽快开赴东北。<sup>3</sup>

7月9日，林彪签发四野兼中南军区总部命令，决定派遣工兵第六团、战防炮团、汽车第一团、汽车第四团、汽车第五团随38军、39军、40军北上。

7月10日，林彪从武汉回到北京后，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保卫国防问题的第二次会议，该会议确定了组成东北边防军的各项事宜。<sup>4</sup>

7月11日，林彪命令万毅率炮兵第一师、炮兵第二师、炮兵第八师及高射炮兵第一团开往安东、辑安地区集结。

7月12日，邓华向林彪请求给他安排一个优秀的兵团参谋长，林彪抽调十二兵团参谋长解方出任十三兵团参谋长。

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任命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以十五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十三兵团领导机关，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7月25日，林彪将十二兵团副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十三兵团副司令员。

从7月29日开始，连续多日，林彪召见邓华，与他在一起研究朝鲜战局、我军开到东北后的任务、各军干部调整配备、人员武器装备的补充、率各军军长先入朝了解情况、部

<sup>1</sup> 《抗美援朝战争史》，2000年，65页

<sup>2</sup> 《吴法宪回忆录》，北星出版社，2006年，461，462，477页。

<sup>3</sup> 吴信泉：《三十九军在朝鲜 1950-1953》，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1-3页。

<sup>4</sup> 《抗美援朝战争史》，2000年，65-66页。

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入朝作战等问题，并根据邓华的请求，建议中央军委任命洪学智为十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并在家中亲自向洪学智面授机宜。<sup>1</sup>

8月24日，林彪与周恩来、聂荣臻一同商决东北边防军的人员补充和供给事宜。

8月26日，林彪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保卫国防问题的第三次会议。<sup>2</sup>

8月31日，邓华、洪学智、解方向林彪提交《关于东北边防军作战准备问题》的报告。他们认为朝鲜“战争已走向长期性，现在人民军虽然仍占主动，但……地面上的优势已经不大。”邓华等人的报告还指出，美军将来的反攻方式可能有两种：一种是以一部兵力在北朝鲜沿海侧后各处登陆，作扰乱牵制，其主力则由现地从南到北沿主要交通线逐步推进；另一种是以一小部兵力在现地与人民军主力周旋，其主力则在平壤或汉城地区大举登陆，前后夹击。<sup>3</sup>该报告还分析了朝鲜战场下一步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新的建议，包括空军参战，增加参战部队，给部队增配高射炮、反坦克武器，加强后勤机构，派得力干部先期入朝侦察情况。<sup>4</sup>

9月1日，林彪向军委提议免调48军，改调50军上东北，以备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9月8日，林彪将邓华《关于东北边防军作战准备问题》的报告转呈毛泽东并附言：“兹将邓华、赖传珠同志来信送上，请阅。信中所提后勤装备等问题，请军委予以决定和解决。”<sup>5</sup>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军武（柴成文）9月8日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撰写的《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聂荣臻在下午面见柴军武之后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则批示让周恩来与柴军武面谈，于是周恩来当夜就见了柴军武。<sup>6</sup>大约在9月9

<sup>1</sup> 杨迪：《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情实况》，19-25页；洪学智：《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413-415页；《抗美援朝战争史》，2000年，73页。

<sup>2</sup>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上），70页。

<sup>3</sup> 《抗美援朝战争史》，2000年，118页。

<sup>4</sup> 《志愿军第一任参谋长解方将军》编委会：《志愿军第一任参谋长解方将军 上 1908-1984》，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90-98页。

<sup>5</sup> 《志愿军第一任参谋长解方将军 上 1908-1984》，89页。

<sup>6</sup>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1），18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77页。

日，柴军武奉周恩来之命去向林彪汇报，林彪向柴军武提了许多问题，如朝鲜的道路怎么样，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如果打败了怎么着，打胜了怎么着，等等。<sup>1</sup>

在美军9月15日仁川大规模登陆后，林彪把四野二局（技术侦察局）局长彭富九和政委钱江从武汉紧急召到北京，向他们交代：朝鲜战争很紧张，“中央正在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可能要我去朝鲜”。林彪要求他们以四野二局为主组建一支技术侦察队伍，**准备随他赴朝工作**，并嘱咐：“此事中央正在讨论中，要做好准备，但暂不要对别人讲。”<sup>2</sup>

林彪当时的司机楚成瑞回忆：“大概在九、十月份吧，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当时，我们都换了新军装，但没有什么标志。毛巾上、水壶上都没有字。林彪家里也在准备，换了住处，还换了一些不宜出国的内勤。”<sup>3</sup>

从林彪的以上活动看，他当时并没有“托病”，更没有“装病”，身体并没有坏到不能去朝鲜指挥作战的地步，而且在做去朝鲜的准备工作。

何况在金日成向中共中央求援后，朱德在推荐林彪挂帅的同时，考虑到林彪身体不是很好，建议林彪可以不出国或不到前线去，而是由他考虑全盘问题。<sup>4</sup>

实际上，现代战争中，统帅的指挥部没必要设到前线，比如，林彪在指挥东北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时间中，他的指挥部设在哈尔滨西南的双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指挥部一直在日本东京；在安排彭德怀挂帅出征后，毛泽东曾经建议，为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彭德怀指挥所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位置。<sup>5</sup>

再接下来，我们看看进入中共中央出兵朝鲜决策阶段的林彪活动：

10月2日，4日，5日，6日，林彪参加了所有重要的中共中央会议并积极发言。

10月8日，林彪和周恩来一道飞赴苏联。那年头，从北京坐飞机到莫斯科可是一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跟随政治局委员张闻天赴任驻苏联大使的何方回忆过当时坐飞机的感受：

<sup>1</sup> 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说不尽的毛泽东——名人学者访谈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387页。

<sup>2</sup> 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史学月刊，2012年11期，78页。

<sup>3</sup> 《我给林彪治“怪病”——访离休老战士楚成瑞》

<sup>4</sup> 刘学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传记丛书朱德卷——红军之父》，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444页。

<sup>5</sup> 《彭德怀传》编写组：《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237页。

“1951年4月，我同他们夫妇二人（笔者注：指张闻天和刘英）同乘一架飞机去了莫斯科。……提起头一次坐飞机，可是出尽了洋相。那时只能乘坐苏联生产的伊尔-14客机。一起飞就开始颠簸摇晃，弄得我翻肠倒胃，吐了一路。而且这种飞机的飞行距离又短，第一天只能飞到伊尔库茨克，第二天还要降落加油一次，才能飞到莫斯科。<sup>1</sup>实际上，张闻天们的这次飞行，途中降落休息、加油和参观的次数一共四次<sup>2</sup>，比何方记忆的还多一倍。何方当时还不到29岁，单是飞到莫斯科就折腾这样，可10月10日周恩来和林彪好不容易到达莫斯科后，当天还得换乘飞机去1000多公里之外的位于黑海之滨的疗养胜地索契去见斯大林呢。

尽管经历了长途飞行的折磨，林彪随后就参加了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艰难会谈。而且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宴会上，林彪顶住了斯大林等人的围攻，始终顽固地既不饮酒，也不向斯大林等人祝酒，而这个宴会直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才结束。<sup>3</sup>

从上述活动看，当时林彪的身体并无大碍，绝非像沈志华描述和想象的那样糟糕。

另外，从林彪后来回国初与出国前的身体状况对比来看，他那时的身体状况还是相对稳定的，因为林彪本人就说过，到苏联休养“效果倒是有一点，但也不太明显。”<sup>4</sup>

### 林彪去苏联治病是早有安排的吗？

此外，据沈志华先生的推测，“林彪去苏联治病应该是早有安排，而毛泽东对此也不可能不知道。”“实际上，林彪是去苏联治病，顺便参与战争问题的商讨。”<sup>5</sup>

事实果真像沈先生说的那样吗？

首先，让我们来看毛泽东1950年9月3日给高岗的复信，信中提到：“林、粟均病，

<sup>1</sup> 何方，邢小群：《跟随张闻天在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武汉文史资料，2010年11期，5页。

<sup>2</sup>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914页。

<sup>3</sup> 《在历史巨人身边》，499页。

<sup>4</sup> 谭云鹤：《见证历史 一个平凡人在不平凡的时代》，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75-176页。

<sup>5</sup> 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史学月刊，2012年11期，77页。

两萧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sup>1</sup>

显而易见，从该信的内容看，在9月3日这个时间，无论是林彪，还是粟裕，都没有去苏联治病的安排，而且短期内毛泽东也不想做这个安排，否则毛泽东就不会说“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了。

确实如沈志华先生所述，当年“按照规定，各国领导人到苏联治病或疗养，都需经过苏联最高领导层批准，还有一系列出国手续。”<sup>2</sup>比如，毛泽东1949年11月21日致电斯大林，就任弼时去莫斯科治疗征询斯大林的意见，次日毛泽东便收到斯大林答复同意的电报，随后中共中央就决定任弼时去苏联就医；<sup>3</sup>又比如，王明1950年9月初向中共中央“请求到苏联医治”，中共中央批准后，毛泽东于9月12日致电斯大林：王明同志“到苏联治病，是否可行望复。”斯大林则于9月18日回复毛泽东：王明同志可随时来莫斯科。<sup>4</sup>假如“林彪去苏联治病……早有安排”，那么一定会有毛泽东和斯大林就此安排的来往电报。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此类电报面世，而这种电报现在根本算不上机密。

其次，如果中共中央当时打算安排林彪去苏联治病，周恩来不可能不知道。然而，周恩来9月8日深夜还指示柴军武去向林彪汇报朝鲜的战况呢，可见此时并没有这种安排。

再者，如果“林彪去苏联治病……早有安排”，林彪本人更不可能不知道，可他9月下旬还向彭富九、钱江交代“中央正在研究出兵援朝问题，可能要我去朝鲜”并要求他们组建一支技术侦察队伍准备随他赴朝工作呢，这证明直到9月下旬中共中央肯定还没有这种安排。

此外，“林彪去苏联治病……早有安排”并不属实的一个旁证是林彪的孩子是粟裕1950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去苏联治病时顺便带去的。<sup>5</sup>

<sup>1</sup>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1），183-184页。

<sup>2</sup> 沈志华：《朝鲜战争初期林彪“称病不出”质疑——兼论毛泽东对入朝作战何人挂帅的考虑》，史学月刊，2012年11期，77页。

<sup>3</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第2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594-595页；《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1），46页。

<sup>4</sup> 郭德宏：《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640-641页。

<sup>5</sup>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粟裕年谱》，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502页；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208页。

而且从10月11日中、苏会谈结束后斯大林等人对林彪的“围攻”来看，他们不像是收到过中共中央告知林彪有重病并要求安排林彪来治病的电报的样子。

最后，退一万步讲，假定毛泽东9月下旬突发奇想，而且只是心里打算安排林彪去苏联治病，可他为什么不抓紧给除沈志华先生笔下的有病者（林彪、粟裕、徐向前）和有事者（刘伯承、陈赓）之外的唯一挂帅人选彭德怀打招呼呢？军国大事可不是儿戏！

毛泽东9月24日复电彭德怀说的是：“同意你偕徐立清同志于十月二日或三日来京商谈新疆工作问题，张宗逊同志的工作亦待你来京面商后再作决定。”<sup>1</sup>

10月2日和3日彭德怀为什么没能如约而至北京呢？只是因为天气不好的缘故吗？

为什么毛泽东10月4日晚上还不同彭德怀谈挂帅的事情呢？毛泽东是什么时间才下定决心考虑让彭德怀挂帅出征的呢？

据笔者管见所及，未发现任何一篇文章把这些问题说清楚，包括沈志华先生的文章。

顺便一说，毛泽东的“林、粟均病，……暂时均不能来……”这段话就是权威官史“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说法的依据。<sup>2</sup>

也是顺便一说，笔者并不认同林彪和粟裕因病不能挂帅出征的说法。

最后，套用沈志华先生那篇雄文结尾的句式做个结论：

领兵出征朝鲜的统帅的选择过程很复杂，林彪的落选，既非是他“称病不出”，更非是他病重那么简单。■

2015年10月初稿

2016年6月终稿

<sup>1</sup> 《毛泽东年谱 一九四九——一九七六》（1），197页

<sup>2</sup>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修订版，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年，172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三版，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年，259页



【评论】

## 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评析(三)

不平

### 5. 70年庐山会议上的马屁

这或许可以说是林彪最后一次马屁。这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拍马屁了。说起来真是可惜，这么好的才干，没有机会再发挥了。马屁学今后能不能发展，也是一个疑问了。前面三个马屁没有白拍，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成为老毛的接班人。林彪尽管不苟言笑，这睡梦里，肯定是笑出声来：人生复有何求？今后，只求上帝早日把老毛召回去了。嘴里说的是：“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一百多岁。”心里恨不得你明天就去死。如果天从林愿，那庐山会议的跟斗，“九一三”的狼狈，温都尔汗的火光可全都免了。可惜，天不从林愿。这不，又一次庐山会议召开了，拍马的时机又来了。和前面三次马屁相比，这次的马屁没有急迫性。老毛既没有明显的对手，现在是最信任的林彪被封为接班人，林彪对于老毛是说不二一的，你画圈，我画圈，大家一起画圈圈，除了马屁，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老毛还有什么不放心？担了多年心的身边的赫鲁晓夫的问题算是终于解决了。前一次庐山会议上，“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现在可是一觉睡到大天亮，也没有什么令人不快的舆论可以令老毛难堪。有那么几声不协调的声音早已被整得半死不活了。一旦有事，二把手出场，“作3个小时的报告”，有这一把牛刀在手，还有什么事可忧？况且，文化革命开始，七八年还没到，老毛也没有再发动一场运动的想法。文化革命已经到了收场的时候了。从政局上来说，已经到了“狡兔尽”的时候了，林彪自可以把自己这把“良弓”雪藏起来，待有狡兔的时候再出山。然而，这时候爆出了庐山事件。没有外患，必有内讧，大概也是一个原因吧。林彪又要开始放屁了，这一个屁，决定了林彪的下坡路，

故而不能不评。在这个大屁以前发生的，也就是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议。这个问题，以后再专题讨论。

就这样，林彪讲话了，也就是开始了“被烈马扬腿一脚，落在臭水坑里，惨不忍睹，臭不可闻”的臭屁：

全会这次的三个题目，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大事，三件大事。这次我研究了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很好！这个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毛主席，是大家所知道的，是我们党、军队、政府、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因素总是多种的，不会是平均的，但是，它必然有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客观的物质条件当然很好，但是很多国家也有很好的条件，他没有成功。我们是既有这种客观物质的基础，加上这种主观的正确的领导，转化为物质力量，所以，使得我们成为胜利的国家，胜利以后，继续前进的国家，而不是中途停顿的国家，是继续革命的国家，是毫无修正主义的这种气味，毫没有被这种世界修正主义的潮流所同流合污，中流砥柱，是很不容易的。

毛主席的这种领导的地位是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来比较出来的。所以，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明，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么陈独秀呀，李立三哪，瞿秋白呀，王明哪，刘少奇呀，中间还有个张国焘，还有什么张闻天，这些，照着他们的领导走下去，就会把革命引向失败，就会要造成革命的重大的这种损失。我们很信任的，在这种各个重要的历史关头，看到毛主席扭转了这种形势，使它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

这是大量的、长时期的重大的事实上所铁一般地证明了的事情。差不多可以说是：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是不巩固。有的时候是巩固的，但有的时候是不巩固的，有些时候很不巩固的，而有些时候是被排斥的，是处于一种“下野”状态的。并不是今天这种情况，完全不是今天这种情况。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可以说这已是我们看惯了的事情，其例子是不胜列举。而这些经验，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这种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必须，特别是年老的这些同志，要把这些思想向下传播，传下去，使这些年轻的同志知道来之不易，就是胜利绝非偶然。不是那么简单的、自然的、必然的就可以成功的；它也可以失败的。很多国家，像欧洲这些国家都进行过共产党的革命，声势很大，力量很大，都失败了嘛，有很好的客观形势都失败了。很好的形势没有搞起来，或者搞起来失败了。

胜利以后这二十年，特别是在文化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子，老实讲，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部门，什么单位，毛主席的威信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对于毛主席著作比较肯学一点、肯用一点的地方，他就人的精神面貌就改变。跟之而来的就是物质的这种面貌强大的变化。不是小小的变化，而是一种翻天覆地的一种大变化。原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做到了。这就是毛主席的这种革命的精神和实际的精神，也就是说具体的政策、具体的做法、具体的指示，一旦深入群众的时候，一旦群众领会的时候，那就是排山倒海的力量来发生变化。主观世界的变化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

你们大家是不是觉得老三篇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另外还有其他的这些具体的政策思想，以及哲学思想，这些都起作用，还有政治思想，多了。几十年嘛！各种问题都接触了，各种问题都有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我们这些人都是参加革命嘛，毛主席几十年写的东西，我们现在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比我的水平高，是有创造的。不但说是科学社会方面可以是创造的，自然科学里面你看哪

一天不在创造？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嘛，社会科学嘛，解放人民的科学嘛，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嘛。他处在新的时代嘛，当然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

同一百年前，百把年前的马克思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前进了很多了。比列宁所处的时代也前进很多了。所遇到的重大事变，跟当时他们所遇到的重大的事变，也多的多，大的多，快的多。如何能说是没有发展呢？毛主席不是都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吗？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回答了这些问题？把马列主义的这种普遍真理与观在国际和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毛主席个人的这种天分、学问、经验来创造出新的东西来。而毛主席这些著作中间所发挥的地方，所具体化的地方，所增加的新的东西，你们翻开马列著作中间他不可能有的，他没有，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是很自然的，没有那个客观嘛，因此，不能对于新的问题作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

如果本人有幸参加这一会议的话，会有什么感受？“唉，这么长的马屁终于拍完了，也难为林彪了。”对这一马屁进行评析，有三大不足：第一是创新不足，再次是时机不对，第三是策略有误。有此三误，难免要吃马蹄子了。

第一，是创新度不足。譬如主人，以前是喜欢吃鱼，那你就以鱼进之。三个月后，主人吃鱼吃腻了，看到鱼已经要吐了。这时你还要进鱼，岂非自讨没趣？有的人还要责怪主人，为什么你以前吃鱼，现在不喜欢吃鱼了？这其实是主仆倒置，不懂得拍马之道。要知道，主人的口味是会变的，要想拍马，就要研究主人的口味，而不能一味把陈鱼烂虾端上去。林太太的“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收回”，也就是“我就是要拍马屁，你逃不掉，你吃也吃，不吃也吃”，已经属于恶拍马屁了，哪有不败之理？你今天说“主人你发福了。”主人或许还受用，过两天，主人想想这不是好词，你还老是“发福，发福”，无怪乎主人要动怒。拍马，一定要做到投其所好，甚至也可以说，“拍马”是“投其所好”的同义词。所以，要想拍好马屁，一定要时时刻刻地研究主人的所“好”。要投其所好，跟其所好，逐其所好。林彪不去钻研老毛的“所好”是什么，却来一个“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不是去“投其所好”，而是去“投己所好”，哪有这样拍法的？哪有不败之理？一匹马往东

走，你就往东拍，马转头往西了，你也赶紧转头。“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一意孤行，继续望东拍，那不是在拍马屁，而是在拍空屁。这是林彪不掌拍马之道。推想起来，林彪大概自以为已经达到马屁学的顶峰了，天下无敌了，从而疏忽了，轻敌了，结果连入门ABC都忘了。就像一个大学教授忘了加减乘除怎么做。

正确的马屁之道，当主人面露不悦之色的时候，应该说：“对对对，我也感到，这鱼的味道就是不行。我马上就去做火腿面包。”而林彪居然说“我还是坚持”。当然，这也可以看出，林彪已经黔驴技穷，拿不出火腿面包，只能以陈鱼烂虾充数。

须知道，喜新厌旧是人的本性。拍马屁不是娶媳妇，有结婚证为凭，你要喜新厌旧，起码是道德败坏。拍马的关系中，你拍我受，有个主从关系，并无条约约束。受者有他喜新厌旧的权利，拍者则只有钻研受者喜恶的权利。一个拍马者不去责怪自己马屁拍得不好，倒反而去责怪你为什么不吃我的马屁。这是天下最荒唐的事。

鲁迅先生形容过一些马屁：“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这就说明，马屁有不同的拍法。你今天说“这孩子相貌堂堂，漂亮极了。”明天看看这孩子丑不拉几的，这马屁不行，那就换一个马屁：“这孩子相貌虽然平常，但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孩子。”过天再看看，这孩子还有点傻不拉几，那就再换一个马屁：“这孩子虽然智力一般，但是他有福相，今后一定会当大官。”哪有抱着一个马屁拍一辈子的？

我们来看一个古例。明朝解缙在殿前应对，朱棣皇帝说后宫妃子生了孩子，解应声道：“吾皇昨夜降金龙”，朱棣皇帝说是女婴，解即接着说：“化作仙女下九重”，皇帝说可惜死了，解再接：“料是人间留不住”，皇帝说丢进金水河了，解出口成章：“翻身跳入水晶宫”。

我们再来看一个近例。说的是今朝的郭沫若。可谓是著作等身，文革一来，统统烧掉。文革中，唱的是：“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文革后，歌的是：“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这郭沫若的东西，多少还有点学术的

成分，这林彪的东东，除了一些阿摩尼亚就没有其它成分，还不舍得丢，那怎么行？要是解缙同志说：“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所得到的，恐怕也就是一个马蹄子。要是郭沫若同志说：“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恐怕连命都要保不住。

这林彪，对解缙的一套领悟不够，天分还是有所欠缺。要不然，这七0年的马屁就会两样了。这林彪，马屁是会拍了，拍得出神入化，无人可及，可惜，对于马屁学中的基本原理领会不够。这才会闹出“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样的笑话。马屁学中的莘莘学子，在练马屁功的时候，千万要以此为戒，莫要重蹈覆辙。

老毛对“天才论”马屁的不悦之意，其实已有一系列的先兆。早在第三个马屁之后的不多天，老毛的一封信内已有所指：“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虽然说“历来不相信”，其实也有些洋洋自得。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以整版篇幅刊登署名杨成武的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12月17日，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请示报告上，做了六点批示，前面三点是：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权威性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毛泽东将他的批示写给“林（彪）、周（恩来）、中央及文革诸同志”，提出“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21日，中央领导同志讨论了毛泽东的批示，表示完全同意，加了批语，转发全党。

70年6月11日，毛泽东会见波德纳拉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陪同接见。毛泽东在会见时高谈阔论。在谈及赫鲁晓夫时，毛说：“……赫鲁晓夫做报告。决议上说，他的报告是叫什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张春桥因为知道此事，才敢于在“吴张争吵”中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

前一封信，曾经由周恩来给林彪看过，后面的批示，林彪当然知道。还有一系列的举动，实际上是告诉了林彪，“天才论”这一马屁已经过时了，该换点新的了。我们再来看吴法宪对“三个副词”的回忆：

八月二十七日早上，林立果来找我，交给我一本“九大”的党章，说是林彪要他来送给我的，并告诉我，林彪要我看一看。早在“九大”上通过的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前面的三个“副词”，就已经不见了。我翻开党章一看，果然如此。

我把“九大”党章拿出来，把写着“党内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争论”的那一页翻给周恩来看。然后我问周恩来：“‘九大’党章中的‘三个副词’为何删掉了？”

这一问把周恩来给问住了，他说，这“三个副词”实际上不是林彪提出来的，而是“八大”由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九大”党章上为何删掉了这“三个副词”，要查一查。这个问题康生也搞不清楚。后来周恩来指示要办公厅的同志去查，结果是毛主席审阅党章时，自己圈掉的。

这就像一匹马，拍它的时候它感到很受用，两天一过，怎么感到这里有点红肿，不太舒服。这马屁还老是往这里拍怎么行？可惜，林彪还是以为，这一马屁能够长久永远地拍下去，一直拍到老毛归西。当然，也不是林彪不想发展马屁，而是马屁这东西，实在不容易发展，譬如从“大英雄”到“诛之讨之”，就是一个发

展，而且是大大地发展。不过从多数来说，林彪虽善拍马屁，却是创新不足。很多马屁，只能属于翻拍，不能算是新屁。拍马屁的另一个要点，在于与时俱进。这就像产品、武术一样，不更新，便要落伍，便要淘汰。用老毛的话来说，“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林彪把“天才论”作为必胜的武器，其实，“天才论”出世之时，确实锋利无比，使用多年，已经钝了，锈了。说实话，舞弄了这么些年，舞出了副主席加接班人，也算是够本了。拿了一把锈了的刀瞎抡，难免伤了自己。

马屁这东西，和其它物品的区别，就在于它易拍难创，更新换代不容易。像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吧，可以一代代的创新。今天XP，明天Windows 7，后天Windows 8。再不行，把Windows关了，开个Door。这一碗饭简直可以无穷无尽地吃下去。可马屁这东西不同，你不能今天五五开，明天三七开，后天一九开，最后一贯正确。你也不能今天是百年，明天说他是千岁，后天说他是万岁。它一定一上来就是一贯正确。几千年前的马屁是“万寿无疆”，几千年过去了，这马屁也只能是“万寿无疆”。总不见得来个“亿寿无疆”。可见这马屁创新之难。你今天拍了马屁，说他能活一百岁。天天说一百岁？没意思嘛。总得更新一下，总得提高一下。怎么提高呢？说他能够活二百岁？不像话嘛。说他句句真理，到顶了吧，下次再要发挥，怎么发展？总不见得说“字字真理”。66年提出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70年再提，那是味同嚼蜡。马屁这东西如同单行道，停车是不行的，倒车更不行，有进无退。那70年该说什么？“全世界共杀之”？反正我是想不出，当然，林彪或许想得出，他是专家嘛。林彪能够从“大英雄”到“诛之讨之”，功夫也算是厉害的了。

说起来，这也是难为林彪了。套句俗语的话，不是共军无能，是鬼子太狡猾了。这不是说林彪无能，而是由马屁这东西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林彪选了一个马屁功作为自己进身之阶。这马屁功共有九招，林彪看看前几招易学易练收效快，拍拍几招，好处一个接着一个来。而且，推也推不掉。这战功得来的元帅、大将，你要推还能推掉，买一张彩票中了奖，你可以把钱捐掉，扔掉，一不小心，会给人偷掉。这马屁功拍来的接班人，那就像孙猴子头上的箍，见脑生根，是推也推不掉的，那就是一个直通车，一直坐到皇位上。这



等好处，全世界的人，谁不想？想不到，练到后来，竟是比较上蜀道还难，这林彪，上又上不去，退又退不下，于是，就在中间卡壳了。拍马屁，就像上贼船，上了，就别准备下了。你说这马臀天天有人拍，舒舒服服的。突然一天没人拍了，痒痒的，岂不难受？这就难怪要踢马蹄子了。

从事马屁行业，心理素质要好，要经得住压，要能够自打耳光，自唾其面。马屁的目的，是为了取悦马臀。只要能取悦马臀，即使是自掴其掌也要做到脸不红，心不跳，不过就是拿脸去摩臀么。拍马，需要的是会看风使舵，一看左臀不舒服了，马上就拍右臀。万不可抱着“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心态。“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的君子，与小人的关系？本来就是小人，何必要充君子？“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那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哪里有什么“观点”，不就是一个马屁么？你把他讲话里的马屁抽掉，看看还有什么观点。就像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会议上被逼发言，拒批林彪时所说：<sup>1</sup>

我认为像林彪这样的人是没有路线的。为什么没有路线呢，因为我对路线有个定义。路线，政治路线是一个政治家对国家、民族的公开主张，这个就不管他是对是错都是路线。毛主席有革命路线，大家都在学，都知道。刘少奇，有“三自一包”、“三和一少”，这也是路线，他都公开讲的。甚至于彭德怀，庐山会议上的万言书，他也是公开主张的啊。说彭德怀有路线都可以，唯独林彪没有。那林彪没有路线，你怎么批林彪，怎么批啊？就是我批林彪啊，林彪不是人，是个鬼，这就够了。

如此一来，梁漱溟又多了一个罪名：替刘少奇和彭德怀等反党分子辩护。政协批判梁漱溟的运动立刻升级，还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批林批孔兼批梁”。

很多人分析了老毛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分歧。说实在的，老毛不愿意再吃屁了，而林彪继续以屁进之，这就是一大分歧。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59年以来，林彪除了屁以外，还有什么？

再说第二个不足之处：时机不对。很多拥林派把庐山会议上的倒张之举捧为大得民心，

<sup>1</sup> 《“反面教员”梁漱溟》，汪东林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这是他们的一厢情愿。从马屁的角度来说，这是时机不对，取败之道。

马屁之贵，贵在点子上，也就是说，要看中时机，要伺机而拍，不能硬拍。俗语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这便是拍马的关键。譬如一个狗吧，主人受人欺负的时候，能够奋不顾身，冲锋在前，主人落水的时候，它能跳水救之，主人潦倒之时，能够进食伺候，而在主人出去探险的时候，能够打头阵，冲锋陷阵。这些，都是属于拍马的良机。主人当然高兴，一定会有重赏，有奖励。但若平时，没有急事，那就一般地舔舔足够矣。如果一定要急于表现，硬蹦乱跳，以为能得到骨头了，实际上，恐怕会适得其反。70年的马屁，很多人辩护说林彪已经当了接班人，不会在乎一个国家主席。其实应该说，林彪此时已经贵为接班人，离九五之尊只有一步之遥，这时的林彪，应该采取守势，只需要画画圈，“万岁万岁”，老毛爱听的话多说几句，不爱听的话少说几句，没必要出来搏击。闭门而坐，苦思冥想，努力钻研怎样把马屁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才是正道。应该要养精蓄锐，磨刀霍霍，等待新的机会，所谓窥测时机，以求一拍。但是，倒张实在不是时机。为什么林彪在此时跳出来，搞了这么大的动静，强势而上？也是一个谜。至少对自己地位的忧虑是一个原因。

59年的时候，老毛要想倒彭，你当然可以口诛笔伐，62年的时候，老毛为“三分成绩七分错误”“憋了一口气”，你挺身而出，强辩枉论，自然是救驾的良机。但是，老毛没有打倒刘少奇的意思，那你也不宜提前出手，操之过急。所谓拍马屁，一定不能干扰老毛的战略步骤。否则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也就是马屁拍在马脚上了。70年的时候，老毛对天才论已经有点不感冒了，又没有倒张的意思，林彪非要来个“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再加上掀张之举。这不是自取其祸么？

邱会作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于罗瑞卿事件是这样描述的：<sup>1</sup>

罗昏了头，刘也昏了头，他们昏了头与当时贺的“兴旺”是有密切关系的。林彪生病期间，主席叫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虽然主席对贺龙也有亲近的话，但毛绝不会把军队交

<sup>1</sup>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402页

给贺。主席的底牌还是林，我们那时离上面还远，我们还能看清主席的底牌，罗是应该能看清的，但罗看走了眼，这就是利令智昏的道理吧。很快刘亚楼醒悟了，他痛哭流涕地揭发了罗。

把邱会作和罗瑞卿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邱会作的高明之处。罗不能看清底牌，而邱能够看清底牌。几年一过，来到了庐山。这时，虽然主席或许说过对张说可以批评，但毛绝不会想到把张搞掉，主席的底牌是林江张并存。我们那时离上面还远，我们还能看清主席的底牌，林是应该能看清的，但林看走了眼，于是这庐山，就成了林彪的滑铁卢了。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

而这次我们不点名地批一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就不得了了，捅了马蜂窝了。我心里真是不明白，毛主席怎么会一屁股坐到江青、康生、张春桥一边去了？

我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边。

你看，这不是，还是看不清底牌。林彪为什么会看走眼呢？找不出其它原因，只能用邱会作先生的理论来解释：“这就是利令智昏的道理吧。”当然，也有可能，林彪是遵循自己的规则，三、四年必有大屁。时间到了，要发作一下，不拍难受。

有趣的是，林彪在这一个大屁之后，立刻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臭屁。8月27日，吴法宪回忆说：林彪还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行武出身，打仗懂一点，搞武的行，搞文的不行，搞文的搞不过他们。这次不该讲话。”

只是可惜，这已经是为时已晚，后悔莫及了。从此以后，从庐山的峰顶一路滑下去，一直滑到温都尔汗。当然，林彪的话，只有最后一句是实话，前面的都是屁话。59年的讲话，刀出鞘，枪上膛，62年的讲话，侃侃而论，66年的讲话，慷慨激昂。一开口就是按小时算的，哪里有什么“搞文的不行”的模样呢？中国历史五千年，文人不知有多少，想得出“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也还不多，看到林彪，都要甘拜下风，自愧不如。至于“搞文的搞不过他们”更是瞎扯，这次是你在搞张春桥，不是张春桥在搞你。你把人家搞得灰

不溜秋的，还说是“搞不过”，实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为自己找台阶。说“搞不过”，是“搞不过”老毛。59年的庐山会议，不是蛮搞得过的么？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不是也搞得过的么？66年的政变讲话，以天下人为敌，不是也搞得过的么？连彭德怀，刘少奇都搞得过，区区几个文人怎么会搞不过呢？所以，可能性只有两种，要么是林彪在瞎搞，要么是林彪在瞎说。

试想一下，59年的马屁后，林彪会说：“这次不该讲话”么？62年的马屁后，林彪会说：“这次不该讲话”么？66年的马屁后，林彪会说：“这次不该讲话”么？这就是好屁与臭屁的区别。拍了好屁以后，一定是得意洋洋，拍了臭屁以后，一定是懊悔莫己。这就像一个人买股票，股票涨了，自然高兴，股票跌了，当然懊悔：“这次不该买这个股票。”其实，拍了好屁以后得意洋洋的，是高手，却不是大师。作为大师，万不能露得意之色，相反，还要能够表态：“我这马屁是没办法才拍的。”这才是大师。林彪就够得上大师。就像一个炒股高手，炒到了好股以后，要把得意劲藏在心里，连连摆手，嘴上说“运气，运气。”至于后生小辈，以此为据：“他说了这是运气。”要么是不懂炒股之道，要么就是别有用心。

林彪一生，真心话极其罕见。四个经典马屁，谁能够找出其中有几句是他的真心话？说老毛是句句真理，其实他自己是句句谎言。句句谎言，成就了句句真理，中国的事，就这么荒唐。不过，“这次不该讲话。”是他的真心话。他自己也闻到臭味了。

再说第三点：策略不对。林彪要倒张，也可以，那就要先作功课。譬如倒罗倒贺，林彪是做足了功夫，得到了老毛的首肯。都是成功的范例。而这一次倒张，却是自说自话，妄自动手。老毛当时，并无废张之意，还曾推荐张为林的接班人。若是老毛有倒张之意，则林彪也不用出逃了，历史就要重写了。把倒张和倒罗比较就可以看出，场景几乎相同。唯一的区别是，倒罗时老毛已有意向，倒张时功课尚未做足，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做功课。而正是这一区别，决定了林彪的败局。林彪做事，一向是审时度势，运筹帷幄。这次为何贸然行动？有人辩说，庐山会议上张不得人心。难道59年的马屁是因为彭德怀不得人心？

难道62年的马屁是因为刘少奇所说不得人心？其实，中国哪有什么人心不人心？中国只有党心主席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是中国人的义务，职责和权利。中国是一个马屁大国。不拍老大的马屁，是傻蛋，不拍老二的马屁，是笨蛋。墙倒众人推，马屁跟着拍，这是常态。林彪的马屁，从来是只看毛心，不看人心的。所以，这又是林粉在瞎拍了。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策略是，继续拍老毛的马屁。你老张反对“天才论”，就是不拍老毛的马屁，就该拿掉。煽风点火，鼓动人心，有点像农村包围城市，地方包围中央。其实，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只有老毛可用，一个不满意，巡视去了，别人要用，那是逼宫，岂有不败之理？要除政敌，应该是倒罗倒贺所用的策略，要采用整材料，告阴状，进谗言，讨圣旨，然后再痛下杀手，这张春桥就成了砧板上的肉，任你宰任你刷了。步骤之中，“讨圣旨”乃是关键，是万万不可少的，否则，就不叫马屁了。

这一套手法，在中国官场是屡见不鲜，随处可见的。林彪本来是这方面的高手，这次却是失策了。整材料和进谗言，并非难事，“反对天才论”是一，叛徒材料是二，都是现成的。不是说张春桥臭名昭著吗？再发动一下，“反毛主席，反对党的领袖”，“影射毛主席”，“骂党，骂中央，骂毛主席”，“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指责毛主席”，“刺激毛主席”，会找不到么？最后，“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不就满贯了？

很多人辩说，林彪的发言得到了老毛的首肯。老毛知道且同意，却又批判，那是老毛不地道。这一观点，值得商榷。我们先看吴法宪是怎么说的：

她还告诉我：“明天上午开大会，林总就不准备讲话了。”我在林彪那里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了。

康生讲完后，我以为这天的会议便结束了，没想到主持会议的毛泽东突然宣布：“请林彪同志讲话。”

毛泽东这一宣布，我们都感到比较意外，因为叶群会前曾明确告诉过我们林彪不讲话

的。

我们再来看《陈伯达口述回忆》<sup>1</sup>：“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sup>2</sup>

陈伯达的回忆，成了很多拥林派的主要论据，但是，引者似乎故意地视而不见，就在这句话的下面，陈伯达说：“我愚蠢至极，竟相信了。这件事，我本应直接去问毛主席……”引到此处，还需要解释么？如果说，陈伯达认识到自己是“愚蠢至极”，那么，现在的一些辩护者就是连“愚蠢至极”的陈伯达都不如了，比“愚蠢至极”更愚蠢的是什么呢？在这两段话的前面，陈伯达还有一段话：

在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里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一个房间等待，等的时不短。他们谈完出来后，大会开了。原定的议程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的问题，并没有林彪讲话的安排，但林彪忽然抢先讲话，记得是讲关于宪草里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

看看陈伯达所说，这像是老毛知道的样子吗？张聂尔女士说：

据林彪秘书李春生回忆，叶群回来说：首长开会前和主席谈话，她在走廊散步，防止十一楼（指江青）闯进去。又据吴法宪说：林彪告诉毛泽东他要讲话。毛问：讲什么？林答：主要是天才问题，现在党内有人反对天才。毛问：谁？林答：张春桥。毛没说话。

连陈伯达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居然有人会当作至宝，也是趣事一件。陈伯达去问林彪，难道林彪能说，会说“毛主席不知道，是我自作主张的”？当然也有可能，林彪提出过，老毛也同意过。老二要发言，老大说“不行”，这样的事例全世界都不容易找。同意，也不过是同意你发言，哪有让你搞成个“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气势？同意你发言，和同意你发言的内容，这是完全两回事。59年庐山会议，老毛还把彭德怀的信发下来，难道这就表示老毛赞同彭德怀了？七千人大会上，朱德要发言，征求老毛意见，特地写信：

<sup>1</sup> 《陈伯达口述回忆》，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374页。

<sup>2</sup> 张聂尔：《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230页。

“主席：送上讲话草稿，请你修正。并问你好。敬礼 朱德。”林彪，素来是“主席画圈我画圈”的，难道不知道？

老毛当时没有拿掉张春桥的意思，难道辩护人连这个都不知道么？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说过“毛主席也对林彪表露过，对张春桥似有器重之意”。林彪自己都承认这是臭屁了，而有些人还要为之辩护，这就像臭屁上洒香水，兀的不叫人恶心。

李作鹏先生说“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烈马扬腿一脚，把林彪踢翻了，落在臭水坑里，惨不忍睹，臭不可闻。”是说得不错的。归根结底，是林彪自己马屁拍得不好，拍错了部位，自惹其祸，没必要怨天恨地。

人，总是有点迷信的，本人也不例外。什么地方捡到了一个皮夹子，就把这里当成是幸运之点，以后经过这里，就会脚步走慢一点，眼睛睁大一点，看看幸运会不会再次光临。我想，林彪恐怕多少也有点这样的迷信，上一次庐山会议捡到了一个皮夹子，就以为庐山是幸运之地，会给自己带来幸运了。用当下通俗一点的语言说，林彪之败，是因为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拍了一个错误的马屁。当下的年代，颇有一些有志之士，他们对林彪的一系列马屁不感兴趣，倒是“九一三”颇为热衷。推想其原因，大概因为这马屁有点臭，要掩鼻而研，于身心不利，而“九一三”则又有火，又有光，何其雄哉。而且，据说经过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结论是：没有老毛的南巡讲话，便没有林彪的出逃。这话有点道理，不过只说了半句。完整的句子应该是：没有林彪的庐山臭屁，便没有老毛的南巡讲话，也便没有林彪的仓皇出逃。他们的研究，就像有人造房子，不造底层，只造二层三层。也不知是怎么造的。

## 6. 四个经典马屁的比较

下面再把四个经典马屁比较一下。

从目标来说，59年的马屁是对人，故必须上纲上线，挑拨离间，刀刀见血，剑剑穿心。

62年的马屁是对付舆论，故必须颠倒黑白，指鹿为马。66年的马屁为的是开道，故必须引经据典，摇唇鼓舌。这三个马屁，时机都是正好。论拍马的手法，则前两个马屁甚为到位，算是好屁，第三个马屁拍得有点偏，不能拿到满分。70年的马屁是稀松平常，没有特色，而且时机不对，只能算是臭屁。

马屁这东西，如同按摩，手势重了不行，轻了不行，一定要恰到好处。老毛吃了第二屁，那是浑身舒畅。吃了第三屁，那就如同饭中有沙。如果说第三个马屁是稍有不舒，第四个马屁就是毫无感觉，甚至倒胃口了。

简洁些说，毛对林彪的四个经典马屁的反应是：立马赐骨头，三年有余味，食之有微词，一个马蹄子。四大经典马屁的后事也是很令人回味的。59年的马屁后彭德怀应声倒台，62年的马屁后三面旗寿终正寝，66年的马屁从此起恶风浊浪，70年的马屁端的是自掘坟墓。

59年的马屁，特点是挑，挑唆，挑拨。口口声声，就是彭德怀反对老毛。

62年的马屁，特点是辩：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

这马屁拍得柔顺，拍得舒坦，比起柯庆施“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要舒服多了。如果以围棋中的段位来比较的话，柯庆施只能算是九级，林彪则可以算是九段。柯庆施的马屁，只比马屁入门的“毛主席万岁”，“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强上一些。司马迁所著《陈涉世家》（载《史记》）中说：“天下苦秦久矣”，现在是“天下想拍老毛马屁的人多矣。”但是，能够拍得出神入化，能够拍得老毛竖起大拇指，能够拍得好处连连的，恐怕也只有林彪一人。即使是林彪的一众徒子徒孙，有谁敢说“我的马屁不输林彪”？虽然现在“青”甚多，要胜于“蓝”，难矣。

现在有些人，喜欢把林彪的马屁和别人的马屁进行比较，以证明别人的马屁比林彪拍



得厉害。这是他们对马屁学不够精通，只懂得一点皮毛，便来枉评马屁。马屁的好坏标准，只在受拍者的感觉如何。这就像一个人追求女朋友，唯一的标准是看女朋友是不是追到手，女朋友是不是满意。要想取悦女朋友，那就要知道女朋友喜欢什么。一味地以金钱来比较：你给我的钻戒只有一千元，人家的可值了一万元。这样的女孩子，能找到好人家么？拍马者和被拍者的关系，又像是厨师和食客的关系。厨师的好坏，唯一的标准是食客的满意。食客有改变口味的权利，厨师只有跟着转的义务。当食客的口味变了的时候，厨师还要不离其宗，那是要被炒鱿鱼的。比厨师，不是比谁的菜辣，不是比谁的料加得多。以为“毛主席一万零一岁！”比“毛主席万岁！”厉害，那是马屁学门外汉的瞎评，说得直一点，那是在瞎拍。后者是马屁，前者只是傻屁。要是马屁这么容易拍，“毛主席亿岁！”早就出来了。你说顶一万句，我就说顶一亿句，有这么拍的吗？马屁之难，也在于此。要揣摩对方的心思，找到这么一个点，啪啪上去，这才叫拍马屁。林彪的才干，在于他肯钻研，肯下功夫，那是后生小辈望尘莫及的。红卫兵当时“毛主席万岁！”喊得震天价响，得到的，无非是天安门的几次接见，幸运一点的，握了一次幸福手。两年一过，统统赶去农村。你说，这样的马屁有谁稀罕？硬说林彪的马屁不如别人，那是对林彪的才干和努力的贬低和不敬。要是林彪在世，那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

马屁学中的另一学派是发明权派。大凡常人，总有虚荣之心，若是挣得了一个发明权，不管是真是假，便有三分得意。这发明权派，却是谦虚得紧。若是证明了祖师爷的马屁是旧屁，是山寨屁，便会洋洋自得。依本人之见，发明权在马屁学中无足轻重。女子追求的是回头率。回头率讲究的是“美”，她的衣服，是自己创造，或是自己裁剪，抑或是山寨货，泊来品，更或是买来的，租来的，甚至偷来的，都无关系，只以回头率高者为胜。马屁学也是如此，讲究的是“媚”，不管你是买来，偷来，泊来，租来。只以回报率高者为胜。山寨手机，赚得盆满钵满，这便是本事，谁在乎你山寨水寨？不过，为了满足一下发明权派，让我们来欣赏一段文字。文字出于《鹿鼎记》，想必知者甚多。

康熙问兵部尚书明珠：“明珠，此事是兵部该管，你以为如何？”明珠道：“圣上天纵聪明，高瞻远瞩，见事比臣子们高上百倍。奴才想来想去，撤藩有撤的好处，不撤也有不撤的好处，心中好生委决不下，接连几天睡不着觉。后来忽然想到一件事，登时放心，昨晚就睡得着了。原来奴才心想，皇上思虑周详，算无遗策，满朝奴才们所想到的事情，早已一一都在皇上的料中。奴才们想到的计策，再高也高不过皇上的指点。奴才只须听皇上的吩咐办事，皇上怎么说，奴才们就死心塌地、勇往直前的去办，最后定然大吉大利，万事如意。”韦小宝一听，佩服之极，暗想：“满朝文武，做官的本事谁也及不上这个家伙。此人马屁功夫十分到家，老子得拜他为师才是。这家伙日后飞黄腾达，功名富贵不可限量。”康熙微微一笑，说道：“我是叫你想主意，可不是来听你说歌功颂德的言语。”明珠磕头道：“圣上明鉴：奴才这不是歌功颂德，的的确确是实情。自从兵部得知三藩有不稳的讯息，奴才日夜担心，思索如何应付，万一要用兵，又如何调兵遣将，方有必胜之道，总是要让主子不操半点心才是。可是想来想去，实在主子太圣明，而奴才们太脓包，我们苦思焦虑而得的方策，万万不及皇上随随便便的出个主意。圣天子是天上紫薇星下凡，自然不是奴才这种凡夫俗子能及得上的。因此奴才心想，只要皇上吩咐下来，就必定是好的。就算奴才们一时不明白，只要用心干去，到后来终于会恍然大悟的。”

众大臣听了，心中都暗暗骂他无耻，当众谄谀，无所不用其极，但也只得随声附和。

看看林彪的马屁，简直就是明珠马屁的翻版。三百年前，看到的是，“众大臣听了，心中都暗暗骂他无耻，当众谄谀，无所不用其极，但也只得随声附和。”三百年后，看到的是，众学子听了，“我们要去寻找一个真实的明珠。”“应该放到三百多年前的环境中去全面观察”，“脱离当时朝内斗争的情况，国际、国内的具体环境及康熙本人当时的指导思想来批判明珠马屁，是不客观的。”我对马屁学日新月异的发展只能目瞪口呆。

66年的马屁，特点是凶，充满了杀气。下面的语句足以令人不寒而栗，心惊肉跳。对于头上有辫子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世界末日。

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

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很多中国人相信报应。林彪最后下场之惨酷，政治人物中并不多见。对于相信报应的人来说，林彪的下场多少有点报应和一语成谶的感觉吧。

70年的马屁，特点是撑，也就是硬撑到底，马屁了无新意，给人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看了林彪的这个马屁，老实说，真为他感到可怜，以这么差劲的马屁来给自己的马屁生涯划上句号。一句“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多少给人酸楚的感觉，已经没有当年挺刀上阵，横砍竖杀的劲道了。话里的意思，已经知道老毛吃这个吃得多了，吃得腻了。可是，这是本店特产，百年传承，没有办法，还是只能拿这个来孝敬。

我们来比较一下62年的马屁和70年的马屁。70年的马屁后，吴法宪说的是：“林彪讲完话，毛泽东就宣布散会。”邱会作说的是：“毛主席对林彪的讲话听得很认真。”“会议结束后，毛主席一边站起来，一边说了两个字‘散会’。”而62年的马屁之后，吴法宪说的是：

听了林彪的讲话，毛泽东的兴致可高了。在林彪讲话时，他一直显得神采奕奕。林彪一讲完话，他就接着讲话说：“林彪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发言。林彪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慎重考虑和分析，作了这样一篇重要的讲话，大家可以好好的研究、考虑。”

好屁和臭屁，一下子就看出来。

分析四个马屁，打彭驳刘，都是老毛有对象在先，故而林彪只需要出手相助。前面三个都是时机正好。第一个马屁，彭德怀上书，老毛正在寻兵觅将，这时，林彪站了出来，马屁正当时候。作为回报，国防部长到手。第二个马屁，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始作俑者，其实就是老毛，多少有点灰头土脸。这时，林彪能强辩枉论，扭败为胜，也是功劳一件。这第三个马屁，老毛三面红旗过了不久，又要开始折腾，搞一场文化大革命。正好需要有人开道劈路，保驾护航，这时，林彪站出来推波助澜，鼓噪助阵。尽管这马屁劲儿稍有不舒，也不失为好屁。这三个马屁一拍，只能是：天下英雄属谁？毛林。一个是拍马屁的英雄，一个是吃马屁的英雄。成就了天衣无缝的马屁搭档，亲密战友。你巩固了逃不掉的万寿无疆，我赚得了新挣来的永远健康。

最后一个马屁，应该是属于过高地估计自己。这是拍马的大忌，可以说是最忌。既要拍马，就得永远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敢于、勇于把热脸去贴冷屁股。林彪以为自己是千岁了，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个小指头的分量。若是林彪懂得这一点，庐山也就不会成为滑铁卢了。

恐怕没有人会否认，林彪在70年的庐山上输了。说起来，林彪参加屁赛甚多，超级大赛有四。总成绩三胜一负，也算不错了。屁赛与棋赛不同，棋赛是对抗赛，两人对决，屁赛是追逐赛，众人争先。裁判只有一个，就是受屁者，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受屁者的满意度，舒适度。林彪能在三次大赛中战胜众多选手，脱颖而出，实属不易。据说林彪还谦虚来着，而裁判坚持，说是名至实归。可见林彪的胜利是不掺水分的。

马屁这东西，是上位的捷径，只是在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它的特点，仔细估量，以免日后遭遇马蹄子，悔之莫及。

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这样评价林彪：“林彪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地位，我认为主要是两点。首先是由于他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巨大功绩。其次，林彪地位的上升，同毛主席的赏识和一手提拔分不开的。”这前一点原因，其实也可以算是有点拍马屁的。彭德怀有没有”

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巨大功绩"？朱德有没有"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巨大功绩"？刘少奇有没有"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巨大功绩"？中国，"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巨大功绩"的人多了去了，结果呢？多少人自杀冤死，和“地位的上升”有何关系？“四人帮”，和林彪的地位不相上下，他们“为中国革命立下了巨大功绩”么？可见，林彪地位的上升，其实只有一个原因：毛主席的赏识和一手提拔。想得到“毛主席的赏识和一手提拔”的人不知有多少，为什么林彪受到“赏识”，受到“一手提拔”？这得归结于林彪的勤于拍马，善于拍马，工于拍马，归结于林彪永远甘当马前卒。试想一下，林彪59年要不是护主有功，对彭德怀痛下杀手，他的国防部长能到手吗？如果没有林彪的二屁，三屁，这接班人会到手么？老毛的“赏识”是“赏识”什么呢？不就是林彪的马屁么。文革中有一句口号：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红卫兵尽管打着这个旗号，其实，根本是在瞎哄胡闹。要说真正把这句口号落实到实处的，也就是林彪一个。

这里，再回味一下邱会作的论断：

罗昏了头，刘也昏了头，他们昏了头与当时贺的"兴旺"是有密切关系的。林彪生病期间，主席叫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虽然主席对贺龙也有亲近的话，但毛绝不会把军队交给贺。主席的底牌还是林，我们那时离上面还远，我们还能看清主席的底牌，罗是应该能看清的，但罗看走了眼，这就是利令智昏的道理吧。很快刘亚楼醒悟了，他痛哭流涕地揭发了罗。

在邱会作看来，罗瑞卿的倒台是他自己活该，是他自己“昏了头”，"利令智昏"，而且还不肯“醒悟”。邱先生看来，在官场上混，尤其是在中国的官场上混，最主要的就是“看清底牌”。这可以说是经典之语。说得率直一点，那就是要看清主子。这就像买股票一样，要看准潜力股。中国的官场的颠颠倒倒，反反复复，不就是主子看不清，不容易看清吗？要是主子这么容易看清，股票这么容易投准，那不就人人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了吗？而四大金刚之所以能混到金刚之位，其根本原因，也就在于“看清了底牌”。现在，有很多人说，老毛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有废林之心，如果此论确实，四大金刚那时

也就应该看清底牌，早点抽身，也就可以避免日后的公审判刑了。在“九一三”以前，跟林不跟贺是对的，“九一三”一到，还是应该跟江不跟林，76年一到，跟江又跟错了。嘿，这股票可真难看准。

《黄永胜回忆录》对《邱会作回忆录》的这一段话，作了很好的注释。其中，黄正两次问黄永胜：“爸爸，那像你这么说，毛泽东其实给了你机会，你听他的不就行了？他是领袖，听了他的也不算错。”“你知道了毛泽东要搞林彪，你就听他的嘛。”<sup>1</sup>这不是在说，老毛给黄永胜透底牌了么？

黄永胜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到底是“看清了底牌”，还是没有“看清底牌”？反正也是“昏了头”，怪不得别人。要是学一学刘亚楼，后来的命运恐怕就会大改变。

当年，周宇驰有一次到上海，把“左派队伍”弄在一起讲话。便说：“你们要支持林立果。支持林立果就像你们存钱一样，一本万利，零存整取。”<sup>2</sup>周宇驰所说，实际上是跟邱会作异曲同工，一脉相承，得了马屁学的真典。其实，人生就跟买股票一样，不都是投资么？差别在于，一个是用金钱投资，一个是用生命投资。设想一下，如果当年邱会作先生能给罗瑞卿一些忠告，譬如说：“你要支持林彪，要看清底牌。支持林彪就像你存钱一样，一本万利，零存整取。”再设想一下，罗瑞卿听从了邱会作的忠告，结果会怎样呢？四大金刚将变成五大金刚，罗瑞卿至少还可以再风光四年多。

当年郭沫若，今日拍江屁，明日拍华屁，成就了这么多的马屁新章。就因为底牌看不清，不知道世事变幻，今日座上客，明日阶下囚。林彪就聪明多了。人云，千错万错，马屁不错，林云，千错万错，拍老毛的马屁不错。任你江海翻转，珠峰倒塌，这老毛永远是座上客。

林彪为什么能一路上扬？李作鹏把这归因于一路马屁，邱会作把这归因于看清底牌。这两者一结合，知道该拍谁的马屁，知道如何去拍马屁，这不成功也难。庐山为什么会成

<sup>1</sup> 《军人永胜》，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551页

<sup>2</sup> 《原空军作战部长鲁珉谈林立果》，引自《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 | 作者：张聂尔

为滑铁卢？一是廉颇老矣，马屁也不知道怎么拍了，二是没有看清底牌，不摔跤也难。

很多人喜欢把59年和70年的两次庐山会议相比。这两次庐山会议也确有相似之处。一个相似之处是两次会议都缺不了林彪，而哪里有林彪在场，哪里一定有马屁哄哄，臭气熏鼻。区别在于：前一次马屁，正好拍在马臀上，部位不上不下，不高不低，恰到好处，从而造就了林彪的窜红；后一次马屁，只顾着自己出手方便，拍到马脚上去了，预示了林彪的窜逃，最终，“落在臭水坑里，惨不忍睹，臭不可闻”，以至于至今还有这么多人只能捂着鼻子，在“臭水坑”捞。

庐山，见证了林彪的崛起和陨落。两个庐山屁，成了《马屁经》中不可多得的正负范例。

中国现在的小学生语文，常常有成语造句这一个条目。很多小学生感到困难。其实，只要他们记住了林彪这个人，很多造句就不困难了，譬如，奴颜婢膝，卑躬屈膝，捕风捉影，指天发誓，添油加醋，强词夺理，阴阳怪气，信口雌黄，厚颜无耻，颠三倒四，天花乱坠，察言观色。当然有人会说，这是因为林彪倒台了的缘故，所有的脏水当然可以往他头上泼。其实并非如此，之所以这些成语和林彪有关，并非因为林彪的倒台，而是因为林彪会拍马，而所有这些成语，都和拍马有关。马屁学中最著名的定理就是：不精通这些成语，不能成为大师。让我们套一个三段论的句式。大前提：不精通这些成语的人，不能成为马屁大师。小前提：林彪是马屁大师。结论：林彪最精通这些成语。这里的逻辑有什么问题么？有谁不承认林彪是马屁大师么？不承认林彪是大师的人，不能算是林彪的好弟子。

拍马屁的大师，要能够明知这是黑，能把它说成白，明知这是鹿，能把它说成马。干脆一点，也就是能昧了良心。这才是最高境界，最高水平。林彪便具有这一水平，故不愧为马屁大师。林彪在公开场合的一些讲话，和林彪的一些笔记，摘记一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而林彪的徒子徒孙能够为林彪的笔记欢欣鼓舞，为林彪的真心话大唱赞歌，为林彪的昧了良心大唱赞歌：“林彪心里知道这是黑的，林彪心里知道这是鹿。林彪是多么高明啊！”这也可以算是人类世界难得见到的一道风景线了。

很多人说林彪为了自保，我也相信。问题是林彪想自保，却没能保住，最终保到温都尔汗去了。看起来，林彪的功夫实在不怎么样。后生小辈，不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庐山会议上，林彪要怎样拍马，才能真正地保住自己？自保，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如果为了自保而拍马的话，也情有可原的。林郎马屁甲天下，损了名节丧了命，这就大大的不划算了。

林彪后半生的主要贡献，也就是马屁。论林彪而不论林彪的马屁，就像论林彪而不论他的军事一样。对于林彪的诸多马屁，尤其是四大经典马屁，马屁学中的莘莘学子，理当好好总结经验，找出其成功的秘诀，分析其失败的原因，这才能使马屁学发扬光大，不辜负了林彪的遗愿。一些林粉，对于林彪这么多经典之作，不置一词，不屑一顾，实在是辜负了林彪多年的心血结晶，令人遗憾。虽然，拍马屁只管往高处拍，但是，把马屁学作为学科来研究，却必须有实事求是之心。有好屁，必须予以肯定，有臭屁，必须予以否定。如果一味吹捧，好臭不分，于马屁学，于自己并无益处。现在的林粉，却正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好屁不赞，臭屁不责。明明是好屁，实践已经证明了是好屁，却把它们说得稀松平常，仿佛谁都可以拍得出，把林彪殚精竭虑，勇者无畏的功劳一笔抹杀，而对林彪自己都闻到臭气的臭屁，却偏要为之辩护，也不看看这臭屁带来的是什么，为什么会一败涂地。林粉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分不清拍马和研究马屁学的区别。看他们好像是在研究马屁学，用的方法却是拍马屁的方法。■



【资 料】

## 吉林省暨长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8年3月10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全面落实您的最新指示的大好春光里，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战鼓声中，吉林省革命委员会诞生了！长春市革命委员会诞生了！

这是您光辉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响亮凯歌！这是人民解放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创建的丰功伟绩！

我们满怀无限喜悦的革命激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喜！报喜！报喜！长白山下春来早，松花江畔红烂漫。今天，从东部碧绿的林海，到西部金色的草原，从马达轰鸣的工业城市，到盛产大豆高粱的广阔农村，山在欢呼水在笑，红旗如海歌如潮。无限忠于您的各族一千七百万英雄儿女，手捧红彤彤的宝书，面向金灿灿的北京城，喜泪盈眶，纵情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主席啊，毛主席！天大地大不如您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您亲。是您高瞻远瞩，创造性地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史无前例、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是您亲手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发出了伟大的进军号令，全国亿万军民以雷霆万钧之力，排山倒海之势，摧毁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是您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教导，鼓舞我们高举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大旗，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揪出了中国赫鲁晓夫在吉林省的代理人、大叛徒赵林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一败涂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了。

是您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进行生死搏斗的关键时刻，遵照您的伟大指示，坚决一致地支持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同我们肩并肩，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坚强的后盾。

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吉林省文化大革命的多次指示，充分体现了您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深切关怀。您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象及时雨，滋润着我们的心田；象光芒四射的灯塔，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如雨后春笋。到处大摆斗私，批修的战场，高举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旗，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我们充分开展“四大”，按照您的干部政策，对干部进行了群众性的审查，促进了革命的“三结合”。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哪一个胜利不是您光辉思想的结晶？！哪一曲凯歌不是您的革命路线谱成？！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是您英明领导的伟大抗日战争的胜利，把我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

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是您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高举您的军事思想的伟大旗帜，“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领导军民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鏖战辽沈，解放了长春，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灭。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十五年前，您亲笔写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十一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照耀着我们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锦绣前程。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十年前的春天，万道金光照春城。您千里迢迢，神采奕奕，来到我们中间。您亲切的关怀，伟大的教导，鼓舞着我们掀起大跃进的滚滚热浪，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红旗高高飘扬。

毛主席啊，毛主席！看今朝，忆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凝结成一个最最坚定的信念：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靠您的思想，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顶天立

地，昌盛兴旺；靠您的思想，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大旗，无比坚强；靠您的思想，我们伟大的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靠您的思想，我们伟大的军队，如同钢铁长城，举世无双。

毛主席啊，毛主席！跟着您，就是方向！跟着您，就是胜利！我们一定永远忠于您，永远忠于您的光辉思想，永远忠于您的革命路线。我们坚决以林副主席为伟大榜样，读您的书，听您的话，照您的指示办事，誓把吉林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您的思想的伟大红旗，条条落实、全面落实您的最新指示，大力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让您光焰无际的思想流传万万世！让我们的无产阶级铁打江山代代红！

我们坚决响应您的伟大号召，斗私，批修，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本部门的斗批改，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加强军民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我们一定牢记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百倍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国内外敌人破坏和捣乱，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毛主席啊，毛主席！世界已进入以您的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您是当代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灯塔。您是世界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我们要永远胸怀祖国，放眼全球，迎着世界革命的风雷，紧紧地跟着您，奔向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方。

毛主席啊，毛主席！长白山和中南海，相隔千里远，一千七百万英雄儿女，红心和您紧相连。红太阳的光辉普天照啊，我们日日夜夜战斗在您的身边！松江碧波流千里，说不完我们对您的无限敬仰，无限热爱；白山松涛响万代，唱不尽我们对您的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我们千遍万遍欢呼，我们千遍万遍歌唱：敬祝您——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

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资 料】

## 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8年3月25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今天，长江门户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光荣地诞生了！

从苏北平原，到江南水乡，红旗似海人如潮。毛主席啊，毛主席！哪里不在尽情地欢呼，哪里不在纵情地歌唱，欢呼您最新指示的伟大胜利！歌唱您亲手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支”“两军”工作的卓越功勋！千百万人民从心坎里发出最美好的祝愿：敬祝您老人家，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这盛大的节日里，战斗在黄海前哨的您的四千七百万英雄儿女，更加深深地想念您啊，我们的恩人，我们的救星！

“长夜难明赤县天”。在那黑暗的旧社会，三座大山压在我们头上多少年啊！旧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老巢，群魔乱舞，鬼蜮成灾。秦淮河，积淀了多少污泥和浊水；扬子江，饱含了多少劳苦人民的血泪和仇恨！

毛主席啊，毛主席！苦大仇深的江苏儿女，跟着您，前仆后继闹革命，出生入死求解放。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照亮了江苏人民武装斗争的道路！

延安窑洞不灭的灯光，指引着我们的胜利方向！

多少无限忠于您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写下了不朽的诗章！雨花台下的《国际歌》声啊，

永远激励我们牢记您的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百万雄师，排山倒海！千里江面，战帆如云！在这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啊，毛主席！正是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粉碎了中国赫鲁晓夫之流妄图使革命半途而废的罪恶阴谋；正是您“向全国进军”的伟大命令，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敬爱的毛主席，解放了的江苏人民，在您的指引下，踏上了社会主义的征途！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您高瞻远瞩，从昆山县一个乡，看到“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戳穿了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嘴脸。英雄的江苏儿女，高举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建设起社会主义的宏伟大厦。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象当年百万雄师过大江，轰垮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

敬爱的毛主席！遵循您“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教导，沿着您所指引的革命航向，英雄的江苏儿女，打响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人民战争”。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江苏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挽手，心连心，“横扫千军如卷席”，把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一小撮走资派，打得落花流水。

敬爱的毛主席！您教导我们：“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上海“一月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江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陶铸式的个人野心家，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疯狂反扑。“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在这决定胜负的关头，是您一系列最新指示，拨开了层层迷雾，顶住了阵阵妖风。您“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使我们和亲人解放军团结战斗，粉碎了阶级敌人妄图毁我长城的罪恶阴谋！您“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亲切教导，使我们识破了阶级敌人制造分裂、挑起武斗的恶毒鬼计！您“要斗私，批修”的伟大纲领，指导我们反对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斩断黑手。在以您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下，江苏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了！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了！

毛主席啊，毛主席！回顾这艰难而伟大的历程，哪一个决策不是您亲自制定，哪一个战役不是您亲自指挥，哪一个关键时刻不是您指明方向，哪一个胜利不闪耀着您伟大思想的光辉！

敬爱的毛主席，您说：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就是好！您亲手培育的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一定要捍卫您的光辉思想，执行您的革命路线！我们一定牢记您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永远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

敬爱的毛主席，您的光辉思想，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要用您的思想统帅一切，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我们一定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您！我们要让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遍地开花，让您亲自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大大发扬，“斗私，批修”！让江苏省和南京市革命委员会永远掌握在无限忠于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让无产阶级江山千秋万代永远保持鲜红鲜红的颜色！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您最新指示的全面落实，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我们向您保证：我们一定更加热烈地响应您“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在祖国黄海前哨筑起钢铁长城；我们一定要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江苏省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等散布的一切流毒，巩固、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节约闹革命。我们一定紧跟您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啊，毛主席！永远忠于您的江苏儿女，最最衷心地祝愿您啊，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资 料】

## 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

### 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1968年3月28日

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永远忠于您的浙江省三千一百万军民，满怀革命豪情，向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报喜：您亲自批准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光荣诞生了！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欢呼您光辉思想的又一个伟大胜利！我们高唱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又一曲嘹亮凯歌！我们颂扬您亲自缔造和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又一丰功伟绩！

毛主席呀，毛主席！是您的光辉思想，给了我们革命的灵魂；是您的伟大教导，赋予我们新的无产阶级青春。我们对您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千万颗红心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衷心地祝愿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武装了我们的头脑；是您，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辉理论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就在这里——您老人家指挥过多次重大政治战役的地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浙江的代理人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曾经在农业合作化初期，就一刀砍去一万五千个农业社。他们美化资本主义，把劳动人民饥寒交迫和资产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叫做“天堂”。那边叫嚣：“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这里喧嚷：“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共产主义，吃饱肚皮就是好主义”，实际上就是为了让富农和资本家大发其财。我们能让这些反动家伙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得逞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我们能让这些反革命的走资派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颜色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毛主席呀，毛主席！是您，亲手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最高统帅一声令下，我们就上了战场，从您亲自轰开的中国赫鲁晓夫黑司令部的突破口冲过去，向浙

江省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发起猛烈攻击！渡急流，绕暗礁，打退了阶级敌人一次又一次的猖狂反扑；驱虎豹，缚鲲鹏，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识破了“化成美女的蛇”，揪出了“露出毒牙的蛇”。经过反复较量，我们终于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做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强后盾。强大的陆海空三军日夜守卫着东海前哨，共产主义战士蔡永祥英勇献身在钱江桥畔。人民解放军驻浙部队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并肩战斗，生死与共。

敬爱的毛主席！在每一个困难关头，都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亲切关怀；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英明指示。多少次严峻的考验，多少回曲折的斗争，都是您给了我们勇气，给了我们信心，给了我们智慧，给了我们力量！使得我们心更红，眼更亮，铮铮铁骨更坚强！

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的每一个战果，都是您光辉思想的结晶！我们每前进一步，都是您亲手指引！

毛主席呀，毛主席！在我们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您亲临浙江视察，给了我们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最新指示。这是对我们最亲切的关怀，最深刻的教育，最有力的鞭策，最巨大的鼓舞！

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的伟大教导变成了浙江革命人民的自觉行动，产生了无穷无尽的物质力量。我们遵照您的教导，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全省摆开了“斗私，批修”的战场，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迅速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高潮，革命大联合的高潮，革命三结合的高潮，工农业生产的高潮。

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一定更高举起您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全面落实您的一系列最新指示，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奋勇前进！我们一定继续大办、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两条路线斗争教育，把



革命的大批判和斗批改开展得更加广泛、更加深入；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更加发展、更加巩固；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节约闹革命，进一步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依靠您的光辉思想掌好无产阶级的权、用好无产阶级的权，牢牢记住您的亲切教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们一定要在全省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孜孜不倦地读您的书，老老实实地听您的话，不折不扣地照您的指示办事，忠心耿耿地做您的好战士。我们誓把浙江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让您的光辉思想的伟大红旗，在祖国东海岸高高飘扬，永远飘扬！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一定遵照您的教导：“更大规模地展开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粉碎美帝、蒋匪的一切阴谋破坏，使东南海疆屹立起红色长城。我们坚决执行您的命令：“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水上来，水上打；地上来，地上打；天上来，天上打；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消灭一切胆敢来犯的敌人。

毛主席呀，毛主席！您是大海航行的舵手，人类解放的灯塔，共产主义的引路人，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以战斗在您的时代而感到幸福，以肩负世界革命的重任而感到自豪！

我们把献给您的颂歌天天唱，把您的伟大思想代代传！让我们再一次向您表达最美好的祝愿：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编读往来】

## 1. 不平再答越人

很高兴看到越人先生的“答不平”，也很高兴看到越人先生对于某些人“颠倒黑白的为之辩护更是等而下之”和笔者有同感。只要能够坦诚而谈，则争论，由争论而达到共识，总是有益的。这里再讨论一下与越人先生的分歧所在。

越人先生说：

再来谈谈和庐山会议相关的某些史实，前文就所谓“彭高联盟”发表的意见，不平兄以为有理，但认为和他讨论的“马屁”无关，个人对此有些不同意见。

看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分歧所在。确切些说，对于“彭高联盟”和“华北座谈会”，笔者和越人先生并没有很大分歧。或者说，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意见。分歧在于，笔者认为，评析林彪的马屁并不需要提及“彭高联盟”，或者“华北座谈会”，而越人先生认为，评析林彪的马屁一定要提及“彭高联盟”，或者“华北座谈会”，或者两者兼而提之。如若不提，越人先生便要有“不同意见”。

在上次的答复中，笔者已经说了：

笔者文章的主旨并不是全面地分析庐山会议，也不是全面地分析彭德怀的定性。笔者文章的标题《林彪的四大经典马屁评析》已经指出了这一点。笔者只是想剖析林彪的拍马屁。故而，越人先生如果与笔者有不同意见，最好是针对笔者的文章：或者说林彪没有拍，或者说林彪拍的不是马屁，或者说林彪拍的庐山屁不好。

可是，先生的答复中又提到了定性，“庐山对彭如何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不平兄所言林彪此次‘拍马屁’的成效。”看样子笔者所说的也就是对牛弹琴了。越人先生在一答中大谈“高彭联盟”，在二答中大谈“华北座谈会”。可是，即使先生提到“定性”，也承认“定性”和“拍马屁”有关，可见评析马屁之必要。至于，倒过来，谈马屁是不是一定要谈“高彭联盟”、“华北座谈会”才是分歧。譬如，先生在一复中谈了“高彭联盟”，

却没有谈“华北座谈会”，能不能得出结论：先生的一复“对于相关史料的解读”不够“全面”，没能“避免国内党史研究著作中选择性运用史料带来的种种陷阱”？

笔者同意“在如何创新批彭方面，林之外的不少人贡献甚大”，笔者既没有否认，也没有抹杀他们的贡献，只是因为他们不属于笔者文章范围之内。先生对此还有疑问么？越人先生自可以以“高彭联盟”、“华北座谈会”去写文章，却非要以“不同意见”为题大发议论，岂不是有点文不对题？先生喜欢谈“高彭联盟”、“华北座谈会”，笔者偏好谈马屁，本来是各人喜好不同，何必要强人所难？举个例子吧。一个男孩找不到女朋友，有多种原因。一是脸上长青春痘，其貌不扬，二是身高不够，三是穿着邋遢。笔者若是对他的青春痘感兴趣，是不是一定要谈他找女朋友？

打倒彭德怀，不单单是老毛之耻，是林彪之耻，而且是共产党之耻。除了薄、杨、安，还有更多的人，譬如罗瑞卿，康生，甚至刘少奇，周恩来，“都可说是难辞其咎”。但是在一篇文章之中，是不是要把他们全都过滤一遍？先生东拉西扯，从“高彭联盟”谈到“华北工作座谈会”，也有些许道理，没有人否认其他人的丑行。但是，丑中之丑，就是林彪。即使先生大谈一通华北工作座谈会，最后也只能说“就翻旧账批彭而言，林、薄、杨、安等人都可说是难辞其咎。而基于林在党内的地位，其批彭产生的影响，林在这方面要承担的罪责自然也高于薄等人。”可见，先生的东拉西扯，并不能减轻林彪的罪责。先生所作的辩护，不是很苍白了么？

笔者对先生的一些提法感到很奇怪。先生说：“以往史学研究中确实存在某种黑白分明的历史学叙述，白方的问题顶多是好心办坏事的失误或迫不得已才做了些违心的事。而与之有关的记载也往往是语焉不详。而有些人，至于被选定的黑方，自然是罪恶滔天。”感觉先生看来，历史上不存在“黑方”，而只存在“被选定的黑方”，或者说，并没有什么人是“罪恶滔天”，一些人之所以“罪恶滔天”，只是因为他们成了“被选定的黑方”。笔者不知道这样理解是不是曲解了先生的原意？或者是先生词不达意，没有表达清楚？

先生说的“被选定的黑方”，主语是谁？谁在“选”？是“以往史学研究”么？原来

“以往史学研究”不是在研究一个人是黑是白，而是在“选”黑“选”白。所以，彭德怀有幸，被“选”为白方，于是，光芒万丈，林彪倒霉，被“选”为黑方，于是，罪恶滔天。想来，笔者也是属于“以往史学研究”的，故而黑白分明，而先生则已经跳出“以往史学研究”的窠臼了，故而能黑白不分了。

再说说先生的主要观点，先生说：“林彪此次庐山的表现，站在毛的立场上，可说是既好又不好。”“不好的一面，借用毛文革前夕评价姚文元文章的那句名言，林的批判定性是‘没有打中要害’。”“再说毛认为好的一面，那就是在打倒彭的问题上，林旗帜鲜明的站在毛的一边，通过了毛的‘考验’。”

这里，“毛的立场”“不好的一面”，根据何在？

针对姚文元的文章，老毛当时说“没有打中要害”，接着说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越人先生把前面半句“借用”到了林彪身上。

笔者在文中列举了林彪贡献出来的几顶帽子：“反毛主席，反对党的领袖”，“影射毛主席”，“骂党，骂中央，骂毛主席”，“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指责毛主席”，“刺激毛主席”。先生以为这些都是“没有打中要害”么？都是“基本上是旧瓶陈酒，缺乏足够的‘创新性’”么？

先生说：“再说毛认为好的一面，那就是在打倒彭的问题上，林旗帜鲜明的站在毛的一边，通过了毛的‘考验’。如果不能通过此一考验，林也不可能顺利取代彭主持军委工作。”

笔者很赞成这一结论，所以没有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庐山会议上，别人的态度没有林彪这样“旗帜鲜明”？或者说，庐山会议上，林彪的调子最高，作用最恶劣，故而得利也最大。或者也可以说，林彪为了“通过此一考验”，落井下石，把自己出卖给魔鬼。越人先生马上会说，庐山会议上出卖自己的人多着呢。如果越人这样说的话，笔者会马上表示赞同，没有不同意见，问题是越人先生是不是赞同笔者所说？

再来看先生的下面一段话：

但就毛此次在庐山要批倒批臭彭的目的而言，只翻旧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新账老账一起算”。

先生的这一说法，实在令笔者感到匪夷所思。按先生的说法，毛在庐山上批倒批臭彭的目的是要翻旧账，因为感到翻旧账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又把新账翻出来，“新账老账一起算”。什么是新账？当然就是庐山会议上的一封信。听到很多人说，你在共产党里不能犯错误，一犯错误，也就是有了新账，把你几十年的老账翻出来。“新账老账一起算”。这应该已经是共产党治下臣民的共识了。先生倒好，把这个顺序倒了一下。感觉上，先生的逻辑有点颠三倒四。笔者不明白，如果没有新账的话，为什么要翻旧账？如果没有彭德怀的一封信，毛会去翻旧账么？谁都知道，毛在庐山上倒彭的原因，就是新账，就是彭德怀的一封信，毛感到新账不够，这才去翻旧账。实际上也不是够不够的问题，而是中共惯例，有新账必翻旧账。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开头就说：“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

先生以为这个新账是因为旧账不够才翻出来的么？先生在文中还讨论了新账旧账：

还应看到的是，翻华北会议的旧账批判彭德怀，是当时不少人在庐山会议上批彭时选择的作法。薄一波在回忆录中就谈到，“我发言之前，曾同杨尚昆、安子文同志交换过意见，虽然觉得彭德怀同志的信没有错，但又不能不批，于是我们在批判发言中尽量避开这封信，而主要谈过去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已批评过的几个历史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第869页）。至于那几个历史问题，薄的回忆就避而不谈，只是含糊其词的称之为“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过头的话，”（同上）。而我们今天知道，华北座谈会的批评指控对彭伤害很大，重提这些旧账，无疑又一次伤害了彭。因此，就翻

旧账批彭而言，林、薄、杨、安等人都可说是难辞其咎。而基于林在党内的地位，其批彭产生的影响，林在这方面要承担的罪责自然也高于薄等人。但就毛此次在庐山要批倒批臭彭的目的而言，只翻旧账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新账老账一起算”。

先生知道薄一波为什么要这样说么？这就涉及到新账和老账，现行和历史的问题。在薄一波看来，他们是避开现行，去谈历史，是一种避重就轻的做法。当然，先生不同意，认为旧账比新账更厉害，并不赞同薄一波避重就轻的说法，故而在旧账上大做文章。“重提这些旧账，无疑又一次伤害了彭”。旧账当然有杀伤力，但是，和新账比较起来，还是要退居第二位。若是旧账足够厉害，那45年就可以把彭德怀打倒了，何必要等到59年？事实上，先生也承认，旧账就是“旧瓶陈酒”。先生以为，陈酒比新酒厉害么？本来是讨论林彪，先生却扯到了薄、杨、安。笔者在此再次承认，对于先生对薄、杨、安的批判，笔者没有不同意见。只是，先生扯到最后，林还是占了“林、薄、杨、安”之首，还是“基于林在党内的地位，其批彭产生的影响，林在这方面要承担的罪责自然也高于薄等人。”笔者就不知道，越人先生的“不同意见”到底在什么地方？

不说薄、杨、安，只谈林彪。同样一个林彪讲话，李锐先生听到的是：

林彪开始只讲了几句话，可谓“击中要害”。为整个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林彪说，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英雄。他讲这几句话时是声色俱厉的。

黄克诚先生听到的是：林彪发言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说彭自己有一套纲领，路线，独断专行，攻击主席，用心很深等。这个发言很厉害，以后成了定性的基调。可是，先生听到的却是：“没有打中要害”，“旧瓶陈酒”，“缺乏足够的‘创新性’”，“没有自主知识产权”。

原因到底何在呢？莫非是因为李、黄两位先生把林彪选为黑方，而先生把林彪选为白方？感觉先生对李锐先生的“是林彪在常委会上定的调子”和黄克诚先生的“定性的基调”甚为不满，认为他们对重建相关史实不够准确，对于历史人物不够公道，认为他们讲话中

有很多“虚假的污点”，认为他们没有做到“憎而知其善”，对于他们把林彪选为黑方颇为不满，于是借笔者的文章来发难。简直要质问他们：“你们散木的文章看过没有？”先生既然认为自己比他们更准确，更公道，更了解庐山会议，掌握有更多的资料，何不写一篇《李锐“调子”论和黄克诚的“基调”论辨析》？也免得他们两位的谬论流毒全国，也可以趁机把林彪身上的“虚假的污点”洗刷一下。至于“真实的污点”就不用说了，想来先生是从来没有说，也永远不会说的。■

## 2. 越人答不平

看了不平文后，又去了他的博客看了他所说增加的关于会理会议的评述，颇感失望。关键是研究历史人物或事件，应由史料出发来逐步构建结论（或推翻原有结论），而切忌先有观点，然后去选择史料支持原有的结论。以会理会议而论，其间涉及的矛盾和相关史实十分复杂，但不平兄的作法仅仅是要尽力论证林之黑罢了，而忽略了其他许多重要的历史细节。如在当时发生的影响到毛对彭产生所谓“误会”的许多巧合或非巧合的事件（刘杨电报、黄克诚的信，因是否打打鼓新场之争论导致毛泽东去职后，彭德怀暂代毛的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和张闻天的微妙矛盾（其中也牵涉到彭），王稼祥在其中起到的负面作用等等。探讨历史，最好是从史料出发，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客观平心，应该是最能站得住脚的。■

## 3. 何芬奇谈沈迈克新著之书名的翻译

162期甚佳。其中所列沈迈克的著作：*Spying for the People: Mao's Secret Agents, 1949-1967*，中译为《用间为民：毛泽东的秘密特情，1949—1967年》，其书名之中译多有可商榷之处，当然还须视其具体内容而定。且，为何是1949—1967，此中很有学问。如果是1949—1976，则另当别论。■

【本刊声明】

##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13日，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mailto: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慕太冲

本期校对：蒋健

本期版式：韦陀